

内部发行，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 研讨实录

第 70 期

70

总结“十二五”，前瞻“十三五”

第 3 届民间智库圆桌论坛——上海经济增长新动力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2201室 Address : Rm.2201,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一五年六月

##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1993 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 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活动了 90 多次，成为了基金会的一个品牌。

从 2007 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 年和 2010 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胡旭照' (Hu Xizhao),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基金会举办的系列座谈会2015年第6期的实录，以及“民间智库圆桌论坛”第3届的实录。

在系列座谈会中，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阐述了对起草中的“十三五”规划的一系列建议。随后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会长胡延照、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张广生、复旦大学教授袁志刚、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石良平等围绕对“十二五”的总结和对“十三五”的前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王战院长提出了十条建议。第一，通过对局部塌陷的改造，实现去产能和转型升级。第二，通过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释放部分产能。第三，给塌陷的地方一个产业政策，使之能够产业转型。第四，万众创新。第五，发挥自贸区和新区的作用。第六，关注外资、外贸、外经问题。第七，注重新能源与生态治理。第八，金融创新，尤其是科技金融和普惠金融。第九，必须考虑社保与养老问题。第十，解决改革与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

“民间智库圆桌论坛”是中国国内多家民间智库于2015年自发建立的学术交流平台。该平台不设立常设机构，每月由各单位轮流主办，就当前大家关注的问题进行研讨。目

前加入的民间智库有：福卡智库、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卓越发展研究院、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华顿经济研究院、远卓管理顾问、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等。其宗旨为“全国的问题，上海的声音；世界的问题，中国的声音”。第3届民间智库圆桌论坛由华顿经济研究院主办，主题是“上海经济增长新动力”。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

## 目 录

|                              |    |
|------------------------------|----|
| 总结“十二五”，前瞻“十三五” .....        | 1  |
| 第3届民间智库圆桌论坛——上海经济增长新动力 ..... | 40 |
| 第一部分：专题研讨 .....              | 40 |
| 第二部分：自由讨论 .....              | 72 |



## 总结“十二五”，前瞻“十三五”

### 系列座谈会 2015 年第 6 期

2015 年 4 月 21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系列座谈会”是我们的不定期会议，规模可大可小，主题也涉及方方面面，不尽相同。前段时间王战对近期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十三五”有一些系统的想法，于是我们找了大家都有空的时间，安排了这次对内的小型座谈会，就相关问题借此机会交流一下。那就请王战先作一个引导性的发言，大家互相也熟悉，希望大家积极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王战**（上海社科院院长）：“十三五”规划已经进入起草过程了，大家有意见都可以在 6 月份前提出来，越快越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可以把问题更深入地探讨一下。这个计划很大，我先拟了几条，先从这里下手讨论。

“十三五”的建议当中，国际环境要稍微讨论一下。现在看来，我认为有三件大事情：一是石油价格战略的影响，这个影响到底在哪里？二是货币战的问题，也就是汇率的变动；三是经济发展。虽然有很多国家是权重很大，但是最关键的还是中美英这三国的经济，当然日本、俄罗斯、欧洲也很重要。现在美国又开始往下掉了点，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这三个国家是最重要。

**胡延照**（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会长）：俄罗斯所占全球经济总量是两个点左右，我觉得不可能再大幅增长了。

**王战：**不好说，我是想到了这块。再就是国内经济形势，也应该做个预判。一个是讲三期叠加，还有目标是讲四个全面，在这五年当中，最后把三期和四都分成上中下三种预判，提前描述出来。“十三五”如果我们做得理想的话，就该知道，做得好，上策是什么；做得不好，底线是什么；中间状态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材料能够做个描述，也是很有价值的。

关于引领新常态的一些判断与建议，以及这次和前面做的五年计划大不同的是什么，我做了两个，广生做了三个。原来都是先定 GDP 增长的幅度，全国是这样，地方也这样，定了之后再来讲产业，产业主要还是在制造业方面。现在讲的新常态就和前面三十几年有个很大的不同，首先是新常态的判断。当然可以做很多判断，但最主要的是两个，一个是就业的底线与增长的合理判断，这条在“十三五”中是确保必须达到的，不然就都乱套了。另一个是去过剩产能与转型升级这两者之间平衡的问题。如果去过剩产能太快，转型还没转成功，效益也会下降。如果维持现在的过剩产能，那就和原来四万亿的结果差不多，创新上不去，转型升级做不到，就是砸钱下去，搞出来的又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所以“十三五”这五年总体上是去产能，在去产能过程中如果能够做到转型升级那就不错了。现在讲的是创新驱动和去过剩产能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

我有十条建议：

第一，现在中央很重视有些地方的局部塌陷。我想给局部塌陷做个新解，它是不是坏事情要依情况而定，可能在中国它显示出来的是坏事情，那就是下滑速度太快，今年要预防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局部塌陷的本质是个去产能的过

程，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发生塌陷的都是产能过剩最厉害的地方，所以它并没有影响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前年是河北、吉林、山西省，去年多了东北的黑龙江和辽宁。但如果说塌陷了以后，这五个省的结构能够调整过来的话，那我们可以每年塌陷五六个，把它们的产能都转过来，去产能再转型升级，那整个五年下来我们可能用不同于发达国家解决危机的方法解决了产能过剩的问题了。但是也不像 4 万亿这样始终把去产能问题往后拖，越往后拖我们会越被动。所以我的想法是“十三五”中是不是可以通过把局部塌陷做一个改造，来实现整个去产能和转型升级，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我认为这是一种办法。

第二，更积极的办法当然是两带一路和互联互通，就是把一部分过剩产能通过两带一路、互联互通分出去一部分。互联互通在国内也有，它实际变成了一种有效投资，这也可以带动我们部分产能利用、设备利用。总的来说，一种是顺其自然地把局部塌陷这一块通过五年战略来去产能，还有就是通过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把现在的产能释放一点。

第三，产业政策与创新驱动的问题。局部塌陷不是说任它塌陷，不是说今年塌陷了，明年自动就会上来。所以需要给这些塌陷的地方一个产业政策，使它能够产业转型。例如现在对微小企业的政策，现在的设定是 20 万。如果在局部塌陷的地方，今年发展速度下去了，去产能了，明年对这些微小企业的政策放宽一些，经济就会有新的增长，企业就会积极的创新，推进产业转型。

第四，万众创新。这是总理很关注的一点，但能不能成气候是大问题。其实我们 35 年来最大的一笔无形资产是什么？就是在市场上闯荡过的一大批人中成长出了一批创业

者和企业家。我有时候晚上看央视 7 频道，里面有很多农民企业家做的事情很匪夷所思，比如说造飞机、造潜艇等等。虽然有些想法并不是很成熟，但 35 年来我们大大激发了普通百姓的创新精神。我这次清明回去，找了一些企业家聊，聊他们是怎么在转型的。有两个企业家说他们刚从美国回来，现在都在做研发。做什么研发呢？比如豆浆机里的整套装置、咖啡机的整套装置，按照其他企业要求做出来，他们有激情去做这些。所以我们真正的企业家今后就产生在万众创新当中的，没有企业家的创新没什么实际意义。如果这批创新企业家能站出来，那中国的创新驱动才真正有希望。单靠国家制定几个大项目还不够，大量的创新应该是来自民间的，我认为这要作为“十三五”当中的重点。

第五，自贸区和新区的地位作用问题。为什么上海这次把自贸区的整个管理体制作调整？现在各地申请自贸区的积极性很高，但是做到 4 家已经够了，若再不断地去批去建，就又变成原来那些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样的机制了，但是没有解决一级政府怎么通过开放倒逼改革的问题。所以这次就设定在浦东新区这一级，用一级政府来解决原来的自贸区拓展、辐射的问题。这样今后的可复制不仅是自贸区的可复制，而是在一级政府开放倒逼机制的可复制。这个想法还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上海和其他 3 家不同，其他 3 家都是有方向性的，一个对台、一个对港。我们这个自贸区还是要为全国提供一点体制机制上的经验的。还有新区，原来的新区从深圳到浦东到滨海新区再到两江新区，目的很明确，都是作为整个区域的增长来考虑的。但这两三年一下子出来了大概八九个新区，每个新区一批都是一千到两平方公里，批这些新区的目的在哪里？要解决中国发展当中的

什么问题？这个很难说。因为我最近做了其中一个新区的材料，据说批的是第九、第十个国家级新区，就是青岛的西海岸城区，2060 平方公里，这个数字差不多是两个深圳的面积。但是做什么不清楚，就只给了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发展海洋经济。再往前面看，舟山搞的也是发展海洋经济，但它怎么去发展呢？内涵是什么？它的发展解决中国的什么问题呢？我们跟领导谈的时候，他们注重的是怎么样在五年当中把产值翻一番，具体的关于自贸区的内涵、目的什么的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认为自贸区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且在“十三五”当中是个大问题。

第六，外资、外贸、外经的问题。去年下半年做形势分析，我们讲了要关注外资外贸双向性的问题。最近商务部牵头一直在辟谣，说中国外贸现在好得很，就是局部的家电行业有点问题等。从结构上讲肯定是有问题的，现在 70% 以上的实际上是服务业，上海市更是 90% 以上是服务业。在加工贸易以后制造业怎么升级的问题，这一块基本上没在我们的外贸外资上得到充分的体现，特别是外资，如果外资这块上不上去，今后一定反映在进出口贸易上，零部件进口，成品出口。中国制造业在国际这一块离不开外资、外经、外贸，这是事实，这也是个该讨论的问题。

第七，新能源与生态治理的问题。这也是“十三五”必须要面对的，当然“十三五”不可能解决掉全部生态治理的问题，但要找到一个新能源作为突破口，找到使整个生态环境从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一个拐点。我主张这个事情从公车采购新能源车开始，这是我们一个独特的优势，全世界都没有的。长三角若是带头把公车改为新能源车，一举三得。一个当然是对雾霾的治理起了个带头作用。第二是有利于反

腐，因为这个车改了的话，续航里程就是一百公里，足够上下班和开开会，但如果要去游山玩水可能就不现实了。另一方面，又绕过了续航里程和充电桩的问题。现在一讨论新能源车就是讨论充电桩怎么布局，其实公车的充电桩全部在车库里，到了车库去充电就可以，没什么问题。而且车辆调集也方便，这部车在充电，如果要出去开会，用另外一部车就可以。另外还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呢，现在公车改革有困难，很难推行。因为首先是处级乡镇这级改了，改了后补贴大概三千块钱。现在中央的也出台了，中央从部级副部级一轮轮下来，到局级实际上只有 1100，而且按照中央的要求今年年底一定要出台的，可是一出台可能就被推翻掉，没办法弄。我说，要有办法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中央 1100 得执行，可以把公车全部改成新能源车，新能源车再给一个 2000 块钱的补贴，那就 3100 了，这样就可以衔接起来了。

**袁志刚**（复旦大学教授）：我插一个例子，我这次去巴黎，发现原来有电动自行车自由出租这个系统，你租了可以随便哪里还。而且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逐步做电动汽车了，租了开到哪里以后，那个地方有一个专门的停车场，还到那里就可以了，这个系统巴黎已经开始了。

**王战**：后来这件事情他们讨论起来，共十个人发言，我是最后一个发言，发言后大家都积极讨论起来了。

**张广生**（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我觉得这个问题你有误解，上次在政协会上你就讲这个问题，我认为在我们国家发展纯电动车，可能是造成全局性的失误。我讲三点：第一，纯电动车不是新能源，它是化学能源的二次转换，这个概念要清楚。第二，和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有关系。比如说法国 80% 是核电，没有火电。而我们国家的火

电是 69% 多，原来是 70% 多，最近我们还要讲核电。我们现在所有的电厂，不要讲二氧化碳回收，连二氧化硫的排放问题都没解决。这次看到各省市报的关于雾霾的来源，电厂是最大的一块。第三，实际上是不经济的。从最终消费者来讲，如果这个城市全部用电的话，当然是有利的。但是要知道一吨煤从煤矿里开采出来所释放出的瓦斯，包括用火车、汽车运出来所消耗的能量，再到电厂发电所排放出来的那些污染气体，然后再消耗，到最终消费者是不经济的。我原先在汽车研究院让他们做这个，后来都没做，因为这个数据很难统计。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做一个测算，假定说我们国家的整个能源结构发展后，火力能下降到只占 20%-30% 的比例，又可以解决粉尘排放问题。但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十二五”要折合成标准煤是 32 亿吨，现在我知道大概是 36 ~ 38 亿吨。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中国是什么特点？中国的特点是领导一有说法，地方政府闻风而动，企业一哄而上，最后的结果是不堪设想。新能源是一个技术路线的问题，假定整个国家的能源结构不调整过来的话，那么它是一个此消彼涨的问题，纯电动车发展得越多，你可能汽车的尾气排放会减少，但反过来电厂那边的排放是在增加的，而且这个增加的危害比我们想的大得多。我们国家就是这样，从上面到下面只讲新能源，但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新能源。新能源不是指过去的化石化学能源，纯电动是化石能源的二次转换。过去讲的新能源，是指可再生的，或除了化石能源以外的其他能源。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根据国情，慎重来讲。法国完全可以，是因为它是核电占 85%，相对来讲是清洁能源，而对于我们国家来讲不是清洁能源。

**王战：**新能源路线图是我们另外要做的一个课题。

**石良平**（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发展智能电网，智能电网是新能源的一种，还是像你说的不算是新能源？

**乔依德**：智能电网只不过是使分配更有效率。

**袁志刚**：这是计算机技术。比如说风电不好储存，在有风的时候这个电怎么来，没有风的时候电怎么来，主要是配置问题。

**石良平**：智能电网可以利用风能、光能，就不用原来你说的那个化学能了。

**张广生**：美国提出来的智能电网并不是讲这个概念。它有各个用户，包括企业和个人的整个用电量，什么时候是高峰，什么时候低峰。因为电不像其他商品可以储存，这是根据用电的整个状况的统计，完全用信息技术来控制，什么时候应该发电，什么时候该少发，什么时候该多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智能电网，是用整个的 IT 大数据来控制的。至于这个电网的来源是火力发电的，还是核电的，还是水电的，还是风电，那是两码事，和这个智能电网没什么关联。

**王战**：为什么新能源控制在 15% 以下，就是因为这个是不稳定的，它必须要通过电网的配电，这个配电要是没有达到智能程度，是没有办法使它平衡的。

**张广生**：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新疆达坂城的那个风力发电是很好的，它是自成系统的，什么时候有风，什么时候没风，有风的时候这个电要上网。我们这次电力体制改革，不是把电闸和网早就改了嘛，怎么上法是技术上要解决的问题。一些上网，一些不上，整个形成了电力的波动，不稳定，所以这个问题技术上没有完全解决。再来看德国，家庭的太阳能发电是个人用的分布式模式，多余的电自己就

上网了，整个一套的运营机制，我们国家现在做不到这点。我们现在都是和网的个别点做交流，通过这个方式来解决，而不是整个技术范围规定它解决的。

**王战：**你刚才举了法国的例子，同样的在美国火电还是占大头的，但是它为什么有用？它有个很特殊的条件，就是火电厂不可能晚上用电少了就停掉，火电本身就是在发电，晚上电用不了的时候，用无线电把轻动力改成纯电动和插电，晚上到用电谷底的时候全停，它取得一个电网的效率。

**张广生：**美国的火电只占百分之三十几，首先结构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因为出现雾霾，所以从 1970 年代开始，它对粉尘的排放是有严格标准的。因此如果我们把现有的电厂以及新建的电厂控制到美国这个标准，每个电厂效用的幅度是 55% ~ 65%，如果改造原有的电厂，那差更多。美国已经解决二氧化硫粉尘排放和二氧化碳的回收问题，我们不要讲回收了，我们现在连粉尘排放都没有解决。实际上 PM10，PM2.5 都没有解决，这可以去调查。

**王战：**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十三五”当中，中国除了互联网经济之外，对我们来讲更重要的是新能源怎么找到突破口的问题。前五年光伏、风电这些我们没有找到突破口。

**胡延照：**你们以后研究研究。我们现在不讲新能源，但至少能源合理配置，做到“节能”。比如我们现在火力发电的配置，比如晚上用电加 10%，或者加 20%。我们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晚上大量用电，发电部门中 60% 左右的电是晚上消耗掉的，这一块如果有办法能够充分利用的话，是很大的节约。

**王战：**在节能合同推广方面，我们有很大空间。

**胡延照：**另外嘉定用电可以想想有什么办法。嘉定能够充分利用太阳能，这一点农村里面很好，这块如果比较成熟的话，在全国不说推广，至少鼓励支持加以补贴。

过去我倡导过在新造大楼下面放一个热水锅炉，下面是地下水的水泥桶，水泥桶到天冷的时候，晚上烧水，第二天用空调，空调就用热水系统来循环。天热怎么办呢？下面制冰跟冻水（4度的）相结合，白天就用空调系统。虽然现在都在做，但这个倡导没有推行下去，推不下去是指没有办法成为国家规定，只能小部分地区做。这个东西技术已经成熟了，问题是推广。我以前管能源的时候在地方上弄两个做样板，我们长宁区里的一个大楼就是用这个系统做的。不过这样一来，也有伤脑筋的事，旧房子建好了下面再建一个水库，比较麻烦。

你如果现在定下来做这个工作，有一块东西永远可持续发展。我讲的意思是把地方上或者民间草根已经在做的一些东西，如果技术上比较成熟，或者虽然技术上不是很成熟但国家能帮助这种技术成熟，譬如通过很多大的研究机构 and 好的大学。这样可以形成一种新的能源配置模式，从国家层面做这个工作，省市也可以做的。16个重大专项，扶持一下，稍微弄一点补贴，电价上再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如果这个工作做出来了，国家节省10%到15%的电是可以的。按照广生的讲法，我们38亿多一点，节约3亿多一点是可以的。

另外，新能源汽车最好还是混合动力。我们城市上下班可以用新能源汽车，还有干部公车。现在的干部都是空降兵，拿上海举例，人可能不住在青浦，但需要从松江到青浦，或是从崇明到青浦经常走的。混合动力可以解决困难，虽然节能节的不是太多，但是清洁能源节能20%-30%是可

以的。如果全市推广，少 20%-30% 的 PM2.5，那效果真是很好了。

大家都知道，美国现在有氢发动机，技术上已经完全过关了，现在商业成本比较高，世博会来过，900 万一辆卖给谁去啊？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技术，万一真的要用的话，也有的用。美国有这个技术路线，而我们国家是什么都想弄，没有确切要做什么。

**王战：**新能源和生态治理是一个大问题，是“十三五”必须面对的问题。我还有三条没讲完。

第八，金融创新。我讲的不是互联网金融。“互联网+”这个东西肯定是写在“十三五”里面的，我们不需要再多讨论了。我讲的是科技金融，就是你所有的创新驱动从头到尾必须形成科技金融链条，使它都有对应。现在上海最吃亏的是我们没有创业板。为什么这一轮深圳比我们做得好，因为它有退出机制。如果没有创业板，没有退出机制，前面的产业基金、风投、天使基金，钱投进去，流动性差，就做不起来。还有普惠金融，现在我们为什么资金贵呢？因为进不到小微企业、创新企业当中去，普惠金融这块到现在路还没走出来。现在想绕开银行，直接从创业板、中小板做，但是现在创业板炒得像赌博场一样，市盈率 88 ~ 100 倍，这个今后肯定有害的。新三板，垃圾股这些东西要形成一个系列。

**袁志刚：**我们专门研究过美国银行的发展。银行开始数量爆多，最后慢慢往两头走，要么规模巨大，要么就是小规模，中间的没有，大量生存下来的就是刚才讲的小的、微的。从理论上讲，大银行是用硬信息，然后是做规模，现在我们都走这个方向，三百多家，原来是农商行的做着做着也都往这个方向走。而美国大量生存下来的是用软信息，

和我们现在做的 P2P 有点像。如果中间能够控制得住，就是知根知底，怎么创业，怎么做，做什么东西，那就都非常了解了。

**胡延照：**这就是信用社，就是属地银行。

**袁志刚：**所以我讲，区分金融发展最根本的就是硬信息和软信息。这个东西我可以在理论上做得很漂亮的。我把整个美国金融史的发展，银行的发展告诉你，结论就是小银行不可少。

**胡延照：**普惠银行也好，包括刚才讲的软硬信息也好，如果不创新，用我们这个银行系统来解决小微企业的信贷问题，是不可能的。

**袁志刚：**不可能的。上边再施加压力，再改什么政策，也都完全不可能，一定要爆发的。

**乔依德：**周小川讲，上面已经定了，银行没有任何的限制，当然它是有标准的，但是没有任何限额。

**张广生：**我们另外有三种方式，一个是必须要有国有股作为主要负责。

**乔依德：**这个都要改。

**张广生：**我们现在批准采取合同制，比如我们现在批准几个民营企业，他们是采取合伙制的，这是第三种。所有的都要批的，但是批要按照门槛，按照规则，要透明公开，只要有实力谁就去办，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目前的状况是，均瑶到现在批了多长时间？

**王战：**还有就是绿色金融，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这四块都要做。

第九，社保跟养老问题也是“十三五”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这跟我们的人口结构、年龄结构都有关系。

第十，改革与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这个动力机制涉及到几个问题，一个是反腐，一个谁公务员薪酬，还有一个涉及到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还涉及到央地事权财权关系。最近楼继伟对地方债只给了 5000 亿的额度，实际地方债务是十几万亿，只给了 5000 亿。结果就是地方政府根本没办法做事，也根本没有做事的积极性，那怎么办？公务员薪酬也是这个问题，工作是轻松了，但是钱也少了，大道理都懂，但没有自己内在的一种激励机制，是没办法做事情。

还有一块没有讲清楚，就是房地产新政的问题。房地产新政关系着去产能化和转型升级，房地产新政就是一个平衡点。我总的意思就是两条：第一，不要把去产能化理想化，去产能化过程和结构转型升级应该是一个互动的问题。第二，我们应该从地方上看中央的总决策，这个我们有优势，中央会觉得地方上反映出的一些问题可能是比较实在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 6 月底要搞的这个材料刚才已经讲了十条了，你们觉得还有什么东西补充？我们最后归拢一下，成熟的写几条东西就可以了。

**胡延照：**王战还是讲得很深刻，你还是很厉害的。我们现在中国经济面临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产能过剩。关于产能过剩问题，我有几个想法。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是不是已经封顶了，我们要确定产能是不是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我个人觉得既有产能过剩问题，又有政策性的问题，是个相对概念。比如说房地产，讲城市化问题，现在真正城市化的只有 5 亿多人，还有 2.69 亿是农民工。中国房地产现在面临什么问题？真正需要城市化的农民工以及新白领这两个阶层，是我们城市化当中真正的动力，这两大块的城市化，一个农民工一个新白领。

怎么把中间梗阻和瓶颈打破掉，我觉得中央要好好研究，我觉得房地产的核心问题就在这里。像现在上海地区房价卖的这么高，资源这么集中，进入上海的人这么多，这城市化怎么弄？所以三四线城市，或者我们说两三线城市，应该合理分布人口，合理分配产量和社会事业，不然房地产市场不好，该城市化的没有城市化。我建议中央对已经确定的两三线城市，加强系统性的政策问题。我觉得有三条。

第一条，特大城市的产能布局，要逐步向资源交通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两三线城市转移，但转移的量不能太多，最重要的转移就是教育医疗，这两块市场化没有办法做，商业、娱乐市场化有条件做，市场化没有条件做的中央要下决心做。我们在都江堰捐的，实际上等于是瑞金医院分院，号称中国第二大的医院。华西去看的人很多很多。农民工也好，新白领也好，最希望的就是把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做好，让两三线城市真正成为一个城市。我们现在有很成熟的优势，郊区分院都搞得都很成功。所以城市化的问题能够解决，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城市还有五年或者十年可以发展。当然像河北这样搞钢铁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宝钢武钢这种应该能够活得下去；到处搞玻璃不行，但是飞耀这种玻璃厂应该能活下去；全面搞水泥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海螺这种水泥厂能够活得下去的。中国政府一定要想清楚，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做的，教育资源也好，医疗资源也罢，两亿六千万农民的城市化问题一定要解决，迟早都要做的，总归要想一条办法出来，能够走出一条路。小产权房到处受打击，实际上是被逼得没办法的一条路，小产权房第一是农民欢迎，农民的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真正分享了改革和市场发展的成果。第二是小白领欢迎，毕竟不用多少钱就可以住

下来了，讲到底产权不重要，至少有个安身的地方。再回过头来讲，这也暴露了一个问题，房子多下来了。中国这个国家，如果能够让我们子孙后代长治久安的，最多就10亿人口了。说到底中国就是人多，现在的矛盾问题都跟人口有关系，住院难上幼儿园难就业难住房难养老难，现在老龄化加重，人口一定是在减少的。我是不太赞成计划生育全放开，但两孩我是赞成的，毕竟生育率要保证。

**袁志刚：**现在你放心，放开也没人生了。绝对不会有三个、四个了。

**胡延照：**现在放开生，孩子生得多就是两种，一种老板，另外一种就是越穷越生。

**袁志刚：**总体不会高的。

**张广生：**上海的调查显示，45%还是愿意生的。

**石良平：**单独二胎放开以后，现在有意愿生的只有15%，占计生委预计可能生的15%。

**胡延照：**另外就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全世界都走过产业主义这样的路，过去美国人也走这条路，日本也走这条路，台湾也走这条路。一定要产能转移，产能转移怎么和一带一路结合起来，这个问题的核心是金融改革，包括刚才讲的外经外贸的改革。国际市场上资源价格和资本价格那么便宜，中国又有这个产能，过去我们两头在外，我们现在也可以两头在外：资金在外面、资源在外面。靠我们的产能，可以做；靠中国的技术工人，也可以做这个事情。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很大的窗口，如果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外汇和产能，这个窗口就不存在。现在就是中国的机遇，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怕风险，鼓励民营企业去干。我们不是要搞混合所有制吗？那就把这些企业带出去。

中国企业要跟着中国中产阶级共同成长。中国中产阶级的孩子想要到英国、澳大利亚等读书，读书就要买房子，那边买一套房子相当于苏州买一套房子，比上海的房子便宜。一方面孩子读书总归要住的，另外一方面亲戚朋友国外去也可以住。老实讲，现在都是深度游了，去旅游都会住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中国人在澳大利亚买了两三万套房子，这个市场是很大的。做旅游有 10% 的利润已经非常好了，不要太贪心了，人家有 2%、3% 的利润都过得去。要让中国的深度旅游出去，不像现在七老八十的没能力，当我们真正退休的时候，我们是有这个能力到地中海去旅游的。我就讲这个可以再持续 20 年，市场肯定是在的。

**袁志刚：**当年日本曾经有过这样的历史，1970 年代，将巴黎地区、菲尔铁塔的资产全买了。

**胡延照：**四万亿计划的时候搞高速公路、钢铁，这我从内心讲是赞成的。四万亿有搞错的地方，也有搞对的地方，可以这样讲，西欧这些国家为什么发展比较慢，因为它已经没历史问题了，它所有的积累都已经完成。我们中国的原始积累都还没有完成，我们现在有很多问题，比如地下水管道没有，所以富营养化，所以污染。如果说这次中央精准发力，能够在两三线城市短缺的基础设施方面，特别是污染设施方面，包括地下管道、节能技术这一块做得好一点，通过国家投资开发公司或财政部的地方债券，大胆一点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讲上海的一段故事，广生你是亲历者，你还记得吗，1995-1998 年的时候我们不是搞区县债务嘛，大家都搞得很紧张。当时黄菊同志高瞻远瞩，说这些债务都是搞技术的事，都是修路修桥用的，就是后十年要用的钱现在来用，

是好事。

**袁志刚：**上海的地铁，我一直认为隧道、铁轨可以永久地国有。因为造一条地铁，地的升值很早就回来了，只是你账挂在那里，桥梁也是这样的，桥两端的土地升值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早已经回来了。这种就要及时清掉，清掉以后再与现在的运营收入、运营成本做比较，通过商业化、证券化，然后引进两家运营商去竞争。后面政府就和真正的竞争者没什么关系了，划清后对中国的未来是有很大大好处的，很多东西就是这个思路。

**胡延照：**经营完全可以市场化，但是你把造价统统压到了经营者手里。

**袁志刚：**经营没有人要的，像地铁没有人要一样。

**胡延照：**债务的问题，我认为对今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以后还怎么发展？

**袁志刚：**关键是有的政策使得地方政府不干事。政府里有中国竞争力最强、最优秀的人才，我们这三十几年发展就是靠这些人拼命干的，虽然里面也有些人是贪污的，但要看到主流是好的。如果这个东西不说清楚，中国的历史没办法交代，真的没办法交代。

**张广生：**就是现在抓了一百个老虎又怎么样，相对于这么大的干部群体来讲，不过就是百分之零点几的事情。

**袁志刚：**这是实事求是，要对历史有个交代。

**石良平：**人才选拔机制，这样最好了。去看看国外，有的竞选出来的州长，行政能力比我们的县委书记差多了，我们的书记是一级级考出来的。所以很多州长不行，是因为他们的体制比较落后。

**袁志刚：**但是我们这十年出了很多问题，什么秘书上去

了，根本没有政绩人上去了，拍马屁的人也上去了。像我们上一任的总理就是这样，没做过省长、没做过省委书记，所以是我们近年的体制出问题了。

**胡延照：**既然要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我们刚刚讲的两桩事情，一个是关于信用社和银行的问题，今后要地方办，要解决万众创业的问题，小微企业就要靠信用社，而且这一块东西风险比你抵押的风险要小。实事求是说，银行这套东西做大项目成本低，做小项目成本吃不消。不要国家出钱，我们村里面大家入股，。另外要想办法扩大免税范围，或者扩大减税范围，中央政府拿多么钱干什么？我想5年100万以下放掉，或者50万以下放掉。20万营业额，2万的利润都没有，怎么创业？现在营业额至少要到100万，10%的利润也就是10万，20%的利润也就是20万，为什么不能免呢？如果他有本事做到30万，那就是一个新的天才出现了，那新的产业不就出来了吗？核心是要让人民富起来，不是老卡着。

**石良平：**农民卖花10块钱一束，结果城管来了，把农民的那个花都从车子上抢走了，不许他卖。结果最后卖成40块，成了垄断，管他有什么好处呢。

**王战：**你刚才讲的那个事，像高新技术在北京能搞得起来，就是因为有了小产权房。深圳能够出华为这么大型的企业，就是因为有城中村。上海全部清光了，所以劳动力成本就上去了。

**胡延照：**讲到底，竞争力就是低成本，除了高新技术新的东西，接下来就是谁的成本最低。新的技术突破没那么容易。互联网伟大在什么地方，就是成本低。另外互联网+这一块前途无量。

**王战：**这一块抓得准。前两年的东西叫升级版，克强经济学，还有新型城镇化。他这次搞一个大众创业，一个互联网+，这两件事情都抓得很准。

**胡延照：**像这个干部状态的问题，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投支持票的。干活做的出边就讨厌了，现在不干事情了又伤脑筋。再回过头来说，我们干部大多数和绝大多数是好的，所以要想办法使干部放下包袱，。

**袁志刚：**现在我们是向着民意上讲的，但如果民意希望看到什么就每天曝什么，那这个就有点文革的味道了。但是如果说上面最高层也是朝着这个，这就不好控制了。文革当年就是这么闹起来的，到最后连毛泽东都觉得控制不了了。他想政治上弄掉一批人，所以他最后弄完以后才解放出来，否则中国怎么前进呢？这个问题现在也要好好梳理梳理。

我听了十个方面以后，觉得确实思考得很深。根据十个方面，我想讲几点。现在认准国际形势很重要，这次亚投行要引起我们的好好思考，要思考为什么突然之间成功，说明国际之间有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已经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开始，也就是说希望中国走出来，不要像以前那样铁板一块。回顾从1970年代美元固定汇率破掉，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美元本身的体系就是互为矛盾的，频繁发作，美元是美国人的货币，但是引起了世界的问题，它把最后的灾害全部都撒到市场，包括1990年代的拉美问题、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包括这次危机以后的6年，发展中国家突然之间那么困难，资金回流回到那边，包括欧洲危机。所以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这个世界必须多元，不能单元。美国的思维就是当年英国的思维，当年英国的思维是区域平衡，就是谁强他就打压住这个强的，然后培训那个弱小的，就是所谓区

域平衡。就一直这么做下来，英国人是这么做，美国人也是这么做，这个东西未必成功。亚投行的事件引申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人民币国际化必须推，人民币国际化是核心命题。现在结算货币已经到了这么高的速度，亚投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家就赌你人民币国际化，英国人先进来，最根本的也是看好你人民币，因为它一直要做人民币的离岸市场。然后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国际化投资，再就是中国的产能出去，以及各个国家加入这个系统以后，增加各自的生产能力。

**胡延照：**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化，就一定要跟着产能投资出去。

**袁志刚：**你投资再用美元作为标准，这样会很麻烦。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看准了，这一点，亚投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人民币彻底的国际化，包括今年 11 月份要加入 SDR，说来说去就是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有多少风险。这个风险真的已经不多了。以前，中国是靠虚假贸易，现在我们不搞虚假贸易，就搞虚假服务。这些你根本控制不住。相反，中国彻底开放了以后，倒是通过价格、汇率获得了均衡。你越去管它，反而越是不均衡。再者，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你后面讲的创新金融，都是在倒逼金融改革。人民币没有国际化，不开放金融项目，不让人家进来在你这边开办银行，你自己靠农村怎么做得得到？这样是做不成规模的。所以，一个是人民币国际化，一个是金融改革，这两样同时一把抓。金融改革是中国产能消化转型或全民创新等等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金融改革的前提是人民币国际化。有人说你先进行金融改革，再进行人民币国际化，这样的说法是错的，我们也

做不到。这第一个问题，就是国际环境。就过剩产能来说，我完全同意刚才胡延照的观点。现在大家普遍讲产能过剩，这实际是没有道理的。最关键的是要去看这个产业有没有竞争力，有没有效率。产业有竞争力、有效率，产能是不过剩的，因为现在国门打开了，产业所面向的是国际市场。问题是相对于狭小的国内市场来讲，产能过剩又出不去。为什么它突然之间会没有效率了呢？这是因为所有的要素成本都在上升。这就显现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产业的要素市场的改革都没到位。

首先，金融价格怎么搞都搞不下去。现在有多少人在赌金融的价格？无论是信托也好，基金也好，其它什么资管也好，这么多人实际上都在赌。因为什么？就是我上次讲过的，中国金融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能力定价。由于金融的定价是混乱的，所以最后它没有办法为实体服务。当然，如果资金量充裕的话，它应该能够为实体服务。股市是这么好，创业板也是这么好，市盈率为什么那么高，为什么打新股会赚得那么好？

美国现在也有这种问题，美国在危机后的6-7年，最漂亮的地方就是金融做得好，就是维护住了资产价值。服务业的就业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工资的提提高，所以它的内需也是很脆弱的。从美国现在所谓的重新工业化来看，美国现在的出口的改善全部在能源方面，因为它能源转变成功了。这一部分顺差逆差的改善非常好，但是在真正的制造业上面，现在问题却加重了。我昨天晚上还在看最新数据，它其实没有根本改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美国的工业，美国的转型也没有达到百分之百。所以制造业里最根本的是竞争力问题。中国除了金融成本上升，最根本的

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背后又潜伏着像房地产价格、土地价格的上升等，统统体现在这上面。所以这一次倒逼金融改革，除了刚才你讲的创新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要自动化或者是互联网+，或者物联网。这个东西逼几年可能就逼出结果来了。

我上次在你那边也讲了一个观点。有次开会，我碰到印度人，印度人就总想接我们的制造业，我跟他们讲你可能难接，这个历史的火车坐上了就坐上了。所以中国下一步的大方向就是节约劳动力，始终保持你制造业的竞争力，一个是提高产业链位置，还有就是节约人工。所谓产能过剩是竞争力下降情况下的产能过剩，不是绝对的产能过剩。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把成本降下去，通过自动化把成本降下去，税收上再优惠。劳动力就是通过自动化，就是通过互联网+，所有的机器设备全部智能化，这个空间很大，但不可能一下子完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全民创新，这个我完全同意。现在全民创新的势头也很好。创新最根本的东西，我上次讲过了，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中国的大市场，你要成功了，那就不得了了，那可是 13 亿的市场。第二个条件是中国的资金，它是如此的充裕。第三个条件就是中国的人才，中国国内经过这几年的努力，确实也有大量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它们有能力做些应用的东西。第四个条件就是解决创新问题要靠风投、靠金融。这四个东西一结合，中国的创新是有办法做到的。

在时间问题上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创新这个东西起码要两三年。这次我去法国，有个教授跟我讲，现在我们觉得困难的东西，当年日本、东亚都碰到过，我们也不要急，

两三年就能解决出来了。他说，这是个过程，他让我千万要注意，要一下子完成是不可能的，它是个慢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大政策是很重要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要用来托底。金融政策做什么？就是向美国人学习，我们千万千万要把住中国现在的资产价格，如果中国的资产价格大规模萎缩，就会造成资产塌陷。这个是一定要玩货币的，货币要玩得好。所以刚才讲地方的资产负债要重新清理，都是为了防止资产塌陷。同时，我们还需要运用财政政策。外部性的东西，也就是市场经济解决不了的东西，那些涉及到能源、环境的千秋万代的東西，都需要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来解决。但是财政必须大力度地清理，比如上海地铁类的“一笔划掉”，还有一个就是变短期债务为长期债务。从大的布局来讲，政府要把央行的资产负债彻底调整一下，可以把现在的四万亿外汇储备，卖一半给老百姓。如果老百姓要出去政府就让他们出去，在人民币国际化当中就让它出去。中产阶级现在这个阶段能买到国外最好的资产，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拥有的，这个配置将来是全球配置，其中包括民营企业，这才叫大国梦。

**胡延照：**真正的中国梦就是这个东西。

**袁志刚：**欧洲莱茵河边上最好的地产都是中国人拥有的，中国没有什么好怕的。最后讲到干部，中国共产党最成功的地方是在适当的时候做了适当的事情，这其中就包括对于地方干部的激励相融，这是极其宏大的一篇文章。政府把这一批干部清理完了以后，让激励机制在反腐败的基础上重新做。比如说，我们的地方融资平台一直这么做下去，靠土地财政一直这么做下去，靠打擦边球的腐败一直这么做下去，这样一个国家肯定也是没有出路的。我就是把它界定

为，适当的时候土地财政是这样的，适当的时候做了适当的事情。但是不能永远延续，我们现在必须要找到新的方式。

**胡延照：**在过去的三十年，它是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现在的作用已经衰退了，你没法再让它起新的作用了。

**袁志刚：**这其中包括金融、土地财政，也都是这样。过去，共产党做的是非常出色的，现在也没办法用现成理论总结，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代人要做的。我们这些人就是理论水平还不够高。

**石良平：**这次我到英国去参加英国学术院的讨论会。这个讨论会我感受到一些很有启发的信息。在这个会上，我们讨论的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我们派上去的代表讲了很多我们的问题。与会的另外 7 所大学的外国代表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大部分都认为中国做得好。我总结下来，大概有三个和我以前感受不一样的观点，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第一，他认为中国有规划，每次中国都有五年规划还有城市总体发展规划。有一个英国人参加了无锡的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的制定，他带了个学生，还有一个学生在复旦大学一起做。在制定规划的后期，他突然发现这个规划非常像 20 年代的规划，整个布局跟那个时候非常贴近。他认为我们中国是有传承的，尽管太湖边上现在有点污染，但是，这种规划在其他国家很少。因为我们有规划，大家一致行动，所以这才会造成中国现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态势。他总结得很好，我们中国学者都很难总结成这样。他说他最近要写一本书，就是写中国各种规划怎么导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第二，他认为中国人本身是具有创新动力的，这样的动力很难得。现在整个欧洲是没什么动力了，再好的制度没有

动力是不行的。现在，他们也在看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万众创新、草根创新。他问为什么要提这个概念，这是我们本来就有的。他接触过很多中国人，一个很小的企业都会去想怎么做一个最新的东西，这种动力在欧洲就很少。美国做大的创新，中国人在小的方面是有创新动力的。当然，这里涉及到体制问题。所以，讲到的很多束缚，其中包括金融方面的很多束缚，我们把它减掉以后，这个创新的动力肯定没问题。

第三，讲到这次亚投行的事情时，他们都非常关心。中国在全球事务的处理上彰显大气。为什么我刚才很同意袁志刚的观点？美国人做事情都是设个局，然后逼着你，英国人在马歇尔计划被挤出的时候，他们很有情绪的。尽管中国现在参与的国际事务不是很多，但是至少中国很大气。在这次亚投行上，我们放弃了一票否决权，这为我们得了分。英国人包括那些教授，他们非常支持英国政府第一个就加入。这个动作就体现了中国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那种大国姿态来主持国际事务。这一条我认为我们要好好总结，接下来我们还沿着这条路走。这就是习近平讲的，让大家搭中国发展的便车，让你得我的红利，而不是美国人认为你搭我的便车。

现在对中国反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透明。他们的研究者也好，官员也好，都有提到这一条。有一个官员讲到，他分析不清楚中国问题。他们很想实实在在跟我们合作，可实在是不清楚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公布的数据是前后矛盾的，文件也是有矛盾的，中央的一个文件到地方这边却不能做了。整个就是系统性不行，有些东西他们看不到，有些东西他们只能去媒体发布的资料里找数据去发现。这个官员

说，这都是没有一种透明的制度设计。这一点在会上讨论的时候被提出来，我们让外界有点琢磨不透。其他的我倒没听他们讲。所以我在想，接下来的“十三五”规划，以上海自贸区作为引领，我们要尽快结合行政透明度和竞争动力的问题。上次艾市长来的时候，他也讲到他们准备做这几个事情。现在，我跟广东、福建、天津一些自贸区接触，他们基本上是按照以前的路子在做，投项目，包括平台，从台湾引进项目。路子跟我们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坚持可复制、可推广这一块东西，坚持国家战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条贯彻进整个“十三五”，上海这一块就已经问题不大了。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乔依德：**王战讲的十点，我觉得非常全面。在讲正题之前，我先提一些小看法。这次的亚投行是比较好的，个人觉得除了大的形势以外，它里面的一些细节做得很好。亚投行请了一个美国人来做法律总顾问，一开始马来西亚人有意见，他们认为我们亚洲发展国家也有人才，亚投行为什么请美国人？所以这一次英国法国会跟上去，可能有这个道理。另外，亚投行雇佣人大量按照国际标准，发达国家中会雇佣很多雇员，所以他这几步是做得很聪明的。我们外交部有个讲法就是不寻求否决权。现在重大问题有 60% 就可以通过，那么我们有了 35%，还差的那 25%，找小的国家弄一弄总归能解决的。但是他表面上不求一票否决，这两步做下来是很打动人心的。

回到正题上面来，你讲的东西有十条，有一点我等一下会讲。但问题是怎么把这个写上去，有几条内容你已经都讲了，主要是考虑写法上的事。第一，你能否看看“十二五”当中有哪些东西没有做得很好，本来要做但没能做得很好

的，在写的过程当中考虑能否覆盖上去？我记得有一次广生好像有讲过一次，好多以前定的东西都没做到，也没人去管。

第二，你能不能集中考虑今后五年，有些东西很长远的可以提一下，集中考虑“十三五”能够做到的东西。比如说，金融开放能否跟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建立联系起来。我说的你里面没有提到的一条就是教育。教育你不要提什么几个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但有几条可否提一下：一个是职业培训跟大众创业升级转型联系起来，职业培训能不能提得更高一点？还有一个也有很多人提的，当然我没有具体算过，就是义务教育能否年限再提高一点。为什么？职业培训还是很重要的，虽然互联网+或者信息化都很重要，但很多情况不完全是互联网能解决的，包括工艺。很多东西，包括飞机发动机，中国老过不了关，它需要大量的试验，工艺方面的东西。这里能强调一下。为什么我会有这个体会？因为我3月初到山东省郓城县待了三天，去看了那里的工厂。一个落后地区的县城，你让它搞高精尖也不现实。互联网也不能什么东西都解决。在工艺上面，发动机老不过关，能不能在“十三五”当中投大量的钱？这也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比有些投资更有效，因为发动机现在是个瓶颈。因为发动机不是10亿、20亿、50亿、100亿的东西，飞机不过关总不能出口，大飞机不要说，哪怕军用飞机都还没过关。我们就是要抓住这最大的瓶颈，加大投资。其中一部分由国家出钱，一部分让企业出钱，因为瓶颈突破成功了以后对它们都有好处。美国也是这样，国防部也给钱，但是最后做出来对企业也有好处，几家大的企业出钱，国家也出一点钱。

另外，国家辅佐机构能否也考虑走出去。这一点，香港的贸发局做得很好。美国的中小企业局也做了很多事情，我在美国的时候去过那里。它很简单，培训你，哪怕是小企业怎么做帐都教你，有时候不收钱，有时候收很少的钱，因为很多小企业都不懂公司怎么弄。政府就这么培训。最基础的方面我们做得不够，我们一说民营企业就是工商联，工商联是政治上的反映，没有从机构上面探讨怎么培训中小企业。你讲的过程当中可不可以有点细化。

总的来说，我觉得你讲的很深，该讲的差不多都已经讲到了，从写法上面我提了几个看法。我要讲的就是这些。你们还有谁要发言？

**张广生：**刚才王战讲的那些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不在于它几个方面，问题在于每一个方面重点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第一，我参加过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其中有两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我组织的，还有两个是我参与的。这些规划包括国家的规划、地方的规划，它都有一个基本问题没解决。我希望在“十三五”规划中，这个问题能有所体现：就是怎么把阶段性、战略性的部署和长远性的战略性的布局结合起来。这个问题是我们各个五年规划都没衔接好的。为什么？我们每一次的五年计划或者规划，都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部署，说的是在这五年要达到什么目标。而每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必须要和长远的战略性布局相衔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因为前几年的规划我们是以两个一百年来衔接的，现在是以建成小康社会前后来衔接。但这个小康社会不足以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参与全球经济的进程以及在世界中的地位相匹配，这个战略性布局和小康社会相差巨大。我们既

要照顾到“十三五”规划中的新常态，包括四个全面衔接的问题，同时也处理好这个战略性布局，要能够立足于长远，立足于今后30年甚至50年的发展。在以前的五年计划或者规划中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怎么把它兼顾起来是现在的头等问题。

第二，讲到战略性布局，我别的不讲，就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也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能解决的。对外来讲，一个是一带一路；对内来讲，现在已经非常清晰的，一个是长江经济带，一个是前几天已经公布而且大家也都认可的城市群发展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在整个国内和国外，如何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问题。我们应该在长远性布局的时候突出这两个点。

第三，我们的创新驱动也好，结构调整也好，都必须确定目标取向。虽然我们的目标取向一定要清晰，但每一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可以不一样。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如果大家还能回忆起来的话，在七五的时候，国家和地方一直在讲，一开始是强调我们要能从粗放式经营转变到精细化经营，后来讲从外延式转变到内涵式。之后，国家又说要让国民经济发展走上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发展道路上来。接着，政府又说到了转变增长方式，后来又把增长方式转变到发展方式。这里面万变不离其宗，最后都有结构调整，结构调整不是今天才讲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讲了30年的结构调整，现在我们还在讲结构调整？首先，我认为结构调整它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但它在一段时间里应该有个相对的稳定。我们现在是处于不间断的动态，没有相对稳定。最后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用上海的例子来分析全国。

上海一直主张发展高科技产业，后来也提倡战略性新兴产业。去年我做过一个调研，要先弄清楚现状。按照国家科委现在统一的口径以及公布的数字，得到现在上海所谓高科技产业的增加值的增值率，产值的利税率。上海在出口中的比重不仅低于北京，低于广东，而且还低于周边的江苏。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表明，从七五一直到了十二五，我们一直在讲结构调整，也没能解决结构调整。这中间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毛病就是出在每次结构调整的目标取向都没找准，阶段性的目标也没有找准，导致上海现在所有的指标，先不要讲科创中心，就从产业本身的发展来说，上海没有任何一个有优势。刚才讲的机器人问题，据我所知，机器人现在的发展是四级，上海只是到两级。尽管中国现在是机器人大发展的时候，但是即使是两级的，里面的发动机、发电机、减速器核心技术都是别人的，你再发展，若干年以后你还得调整，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我们引进汽车大概二十多年，可到现在我们的发动机和变速箱还是没有国外的技术高，更不要提大飞机了。这就得出一个问题，结构调整必须要有目标取向和阶段性目标。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把有限的财力和智力，包括政策资源、环境资源集中起来。我们所说的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也都是在讲结构调整，实际上若干年以后我们还是会在讲结构调整。美国现在的工业平均增加值的增速是在 45% 左右，也就是说一个产品新创造的价值在整个产品的价值里面占 40% ~ 45%。因为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所以现在上海是 14%，也低于北京、广东、江苏。所以我非常怀疑你说的科创中心。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但是这一阶段你要确定的解决什么问题。

第四，刚才讲到的自贸区和开发区新区的关系，无论是

上海也好，天津、福建和广东也好，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现在，从上海试点上来讲，我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自由贸易区讲到底是要适应现在国际经济贸易新规则的变动。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自贸区的试验，我们来解决今后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如何和国际惯例衔接的问题，而不是搞点项目，招商引资。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因为无论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是走出去，我们要按什么规则走是现在的重点。人家不跟你讲中国特色的。而且，我们现在的自贸区主要还是按照人家已经形成的规则进行制度调整，现在正在谈的、将来即将形成的规则就是在谈怎么来适应人家。现在我们还没把这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所以要把这个问题强调出来。我们在全中国办几个自贸区，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要按照国际惯例来办事情，这和中国特色是没关系的，这一点一定要讲清楚。我们试验的目的也是这样，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到世界经济活动中去。

**王战：**刚才你讲的竞争中立的问题，除了负面清单和国民准入待遇，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先行试试竞争中立。

**石良平：**这次外商投资法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在跟美国磋商的第二个谈判里面讲到了。首先，我们对国有企业进一步规范；第二是部分放给市场；第三，高管拿出部分名额在市场上招聘。这些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美国人就担心我们的国有企业就是代表政府，担心有政府的人在帮政府做某一种政治利益上的考量。所以他提出来希望能够竞争中立。

**张广生：**第五，自贸区试验的目标趋向是什么，一定要搞清楚，不是为了带动几个项目，不是降低几个价格。每个

重点里面是解决什么。

第六，完成创新的问题。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像我们这么强调开拓创新的。问题是政府就是要解决有利于创新环境的问题。为什么讲这点？讲创新，现在大家的眼睛都在盯着中国，尽管外国人不讲万众创，但是它每一栋小房子下面都有一个我们现在没有的车间。美国一个孩子为什么能在家里搞一个核反应堆？就是因为他有车库。我们现在大学做专利登记的目的是要评各种各样的职称，他每年要报成果。要让从事教育科研的教授把这个东西拿出去转化，是不可能的。我们发明专利的资源并不比别人少。上海市每年的发明专利是全国水平最高的，有没有可能在政策体制各方面的环境上把它转化出来。我们就讲现有的，不要讲未来。这个环境是最根本、最基础的工作。

第七，结合城市群的发展，结合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资源能不能按照均等化的原则在区域之间合理配置。这就要解决为什么在城市化过程中，那么多人都往大城市涌。这和我们资源配置不合理有关，公共资源的配置完全是政府可以做的，并且完全可以解决北上广人口的急剧增长。其原因就在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这导致了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当中的畸形。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我原来讲过上海廉租房的事，我是坚决反对的。反对的原因有二。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在上海工作的人未必都要住在上海。我就举东京的这个例子。在东京工作的人中，60%多的人不住在东京。现在苏州到上海乘地铁才多长时间。那时候日本小白领的工资是30～35万日元，但是在市区车位一个月的租金是35万日元。他们都是不开车的，上下班都是远离城市的，因为那边的房价高，

都住在远离城市的新干线接近地铁的地方。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基础设施，在长三角地区基本上是覆盖到的。现在各城市间的同城化效应也开始显现，比如说上海的公交卡可以在周边城市使用。如果资源配置能够相对平均的话，这样完全可以解决我们现在大城市的问题。上海这个城市不可能无限增长，这就是需要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最后一个问题，城市群发展战略。1990年代开始提出城市群发展战略。前两天政府也公布了，要在长江中游以武汉为据点发展一个城市群，那是31万平方公里的范围，有好几个地方。现在问题在于怎么解决城市群中各城市相互的分工、产业布局、功能定位以及协调发展的机制。这方面都应该强调一下，这些方面都很重要。

**王战：**但是还是不能面面俱到，要把重点突出。

**张广生：**突出重点了以后，因为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要把阶段性的目标和长远性的布局处理好。通过一个五年计划，可能做到什么程度，然后经过若干个五年计划，逐步把它衔接起来。

除了各项配套措施之外，走出去的目标近期来讲主要是三个。一个是通过一带一路怎么样推动我们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才有可能把我们的钢铁、水泥、玻璃等一系列产能过剩的产业转移出去。我个人认为这个是重点。一个战略性资源的参股、收购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我讲这个是基于我们4万亿的外汇储备。三是适应国内的居民到国外旅游的消费。当年上海建的所有宾馆中间，唯一日本人投资建设的是樱花宾馆，日本的游客来都是住那边，它是肥水不外流的。我们就想，去年出去旅游的人数是一亿

多，走的这几个路线，就针对这些地方去收购，到这个地方旅游的中国游客都住在你这个饭店，你不是大进大出吗，你肥水也是不外流，反过来从文化认知、餐饮各方面来说，游客也是愿意住。

**王战：**去年起草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改革和发展的关系问题。所以这次在后面补上去四个全面。

**孙福庆：**刚刚也讲到，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已经讲了二三十年的老问题，“十三五”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转移产能过剩的重点应该是放在二三线城市的城市化上，实际上在二三线城市的城市化的过程中可以去消化产能过剩问题。

我们的产业升级倒是要考虑现在整个国际大背景，国际资本也好、国际资产也好，现在是最便宜的时候。我们的跨境并购，到欧洲去也好，到美国去也好，要去买什么东西？就是买我们产业结构升级的新的发动机、新的动力。以前跨境并购把重点放在大宗产品和资源上，今后是不是在企业走出去的时候，注重品牌、技术、渠道的收购？这是我们产业升级转型的一个新的动力机制。我看到一个材料，讲 2014 年中国企业在欧洲的跨境并购已经达到 180 亿美金，数额相当大，是 2013 年的 2 倍。现在中国在欧洲收购的趋势越来越大，包括收购一些德国的中小型企业。这方面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现成的案例，包括在发达国家建研发中心和销售渠道网络。刚刚讲到的旅游也是。“十三五”我们最大的红利跟窗口期是在国外，现在我们的人口红利已经逐步消失了。当然，我们自己本身改革也是一个红利，但是企业怎样走出去，怎样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国际资源市场这方面的动力，这也是最大的红利。

第三块就是结构调整。现在很多企业都是五年的生存期，能不能强调百年老店的工艺？浙江宁波的一个企业是百年老店，它这种品牌效应和对产业追求的精神值得提倡。我去看了一个资料，内容是创新跟人口结构有什么关系，资料上说，我们在 25 岁到 40 岁的年龄段是最具有创新力的。1970 年代到 1990 年代的日本，也是靠战后一批 25 ~ 40 岁的年轻人发展得最快。到现在，老实说，它 GDP 的增长动力来源还是这批人当时的创新。我们国家在 1987 年到 1994 年左右出生的，现在 1.8 亿的青年人，是我们这一轮科技创新、万众创新最大的人群。这批人怎么能用好？如果这批人用不好，我们后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那么，怎样为年轻人提供一片创新的绿地？现在的国际背景、国内人口结构正是我们转型升级最好的时期。

**石良平：**我再来补充一点。外资外贸外经这一块可能在整个“十三五”期间，跟我们以前相比，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不是吸引外资，而是我们走出去。特别是刚才袁志刚说到金融变革，在怎么适应这个过程这一方面，上海好像应该率先做些事情。

**孙福庆：**上海的一带一路的核心是金融。实际上，上海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可以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金融。

**石良平：**我们也要组建中国式的跨国公司。我认为现在真正的跨国公司还没有形成。在全球布局、整合资源方面，我们也没啥经验，这个东西在“十三五”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王战：**中国跨国公司在十年的窗口期会形成什么样的规模？

**孙福庆：**加入 WTO 是我们的十年窗口期。今后十年我

们是不是进行资源输出？

**胡延照：**全球资源配置。

**石良平：**这肯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袁志刚：**现在五百强里，我们的规模跟第二大经济体是相应的。但是大量的是国有企业，如果都是马云这样的企业，就不得了了。

**张广生：**跨国公司也有它的标准，我们现在的几百强都没做到，它的海外业务必须要占到 30% ~ 35% 以上，否则你根本就称不上跨国公司。

**石良平：**现在一个公司要称得上全球公司，雇员、资本要占 50% 以上。

**张广生：**我再补充一条，在这次的结构调整中，怎么样适当增强我们国家的产业集中度问题，这个问题要解决。我举个汽车的例子。美国现在的汽车两千万辆，就是三家公司，但是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竞争产品。我们国家除了西藏，几乎各个城市都有汽车生产商，而且历史都不同，它是一个资源怎么整合的问题。煤炭也是这样，在我印象中，苏联的整个煤炭是三大公司占到 70% 以上的。我们的产业集中度还是应该把它提出来。

我们历来的通病就是一般化。我们提出任何的要求，任何的目标，任何的措施，千万不要一般化，一般化到最后都落实不到。比如讲创新问题，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用的是我过去看过的资料，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数据有没有变化。世界贸易中大概 80% 以上是在跨国公司里交易完成的，75% 的技术贸易是在跨国公司之间完成的。那么我就提出一个问题，你看我们现在讲科技创新，从大到小都是一样的要求，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就是你的政策举措不可能对所有的

企业都一样。我专门研究过波音公司。一部飞机是 250 万个零部件，它只解决它的控制系统和发动机，其他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按照它的技术标准外包到全世界去的，但是标准质量必须达到，如果这个标准达不到的话，你就得去创新解决。有一些他解决不了的创新，他可以通过购买其他技术再转移给你。比如上海现在鼓励大企业创新，其中有一项措施是你用于研发的资金视同你的利润。对大企业来讲，仅仅这条根本就是不够，大企业也根本用不着什么都去创新的。大中小企业各自的创新要求是不一样的，它所需要的政治体制和环境也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把一般的号召套用到各类的企业，一个政策怎么可能对 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中小企业都适应呢？这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分类设置。

**胡延照：**产业政策与创新驱动的问题，产业政策不清楚，创新驱动就没法做。

**石良平：**是在国内竞争还是国际竞争？美国本来在国内竞争的东西都把它分拆，但是国际竞争还得把它合并。我们的整个战略是国际竞争，全球配置资源，这就不一样了。

**张广生：**我认为，现在比如说黑龙江、山西、河北包括辽宁所谓的塌陷，实际上原因是不一样的，它根本不是结构调整的问题。

**王战：**也有这个问题，但它不完全是这个问题。

**张广生：**山西前年每吨煤是 580 块钱，去年是 380 块，这样一下子它的 GDP 就掉下来了。黑龙江主要是大庆的旅游和煤，这两块占到新增 GDP 的 50% 以上，这两块下去了，没东西了。河北主要是因为关了小的钢铁、水泥、电厂。

**石良平：**比较集中的周期性产业，一下子往下走了，它

的 GDP 肯定不行了。

**张广生：**当然反过来，它又和全国的结构调整相关。所以短期内它走不出去的。我还专门研究过辽宁，实际上是因为这 20 年来没有找准振兴东北的目标和定位，所以走到现在没走出去，它又伴随着产能过剩，所以它没能成功。

**王战：**产能过剩跟这个有一定的关联。现在宁波的发展就不如杭州，有一段时间宁波的发展比杭州快很多。

**孙福庆：**“十三五”的红利即全球资源配置也是个最大的问题，国内是改革，国际就是全球资源配置。

**张广生：**我建议你对红利问题要有所分析。我讲的是“三利”。第一，改革是会增加红利的，但是它有一个逐步的释放过程。不是说今天改了，明天就表现出来了。第二，改革只提供便利，不提供红利。第三，改革是条例，它不会产生红利的。所以我们认为所有的改革会产生红利，这是一种错误，至少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这要搞清楚。否则我们一讲改革，就讲可以得多少利，这种改革是没有的。老百姓不管你导向对不对，他们只考虑改革对我有没有利。

**袁志刚：**我再补充一点。我最近看一篇文章，关于日本的一些转型，这可能跟我们有关系。大量的僵尸企业拿到银行的贷款继续生存下来，日本在这个结构调整上面做得很差。大概在 2000 年到 2003 年，日本的首相开始真正做了些有用的事，僵尸企业大量下降。但是后来他很快就下台了。我现在就拿它对照中国。中国的问题其实很严重，如果将来中国的破产和并购做得不好的话，结构转型是很难的。怎么样让僵尸企业断血并能够被并购，是结构转型的关键。

**王战：**北京他们是很清楚这个情况，现在三角债已经出现了。

**袁志刚：**这种东西如果蔓延下去，会大量消耗每年新放出来的金融资源，后果就很糟糕。日本也是这样，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它跟老龄化、汇率的上升等等一起作为四大原因之一，使得僵尸企业一直生存下来。

**张广生：**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就等于说企业正常的破产每年占到了 3% ~ 5%，那是正常的。

**袁志刚：**还有一个例子，危机以后的 6 年，美国企业表现比欧洲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企业破产容易，欧洲企业破产不容易。

**胡延照：**欧洲福利主义很厉害。

**袁志刚：**对，有很多阻碍它破产的东西在。

**乔依德：**如果没有什么其他意见，我们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王战：**我们回去再把它变成书面的东西，到时候我们找时间再议。

**乔依德：**谢谢大家，以后有机会还要请大家来探讨问题。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 第3届民间智库圆桌论坛 ——上海经济增长新动力

2015年5月27日

“民间智库圆桌论坛”是中国国内多家民间智库于2015年自发建立的学术交流平台。该平台不设立常设机构，每月由各单位轮流主办，就当前大家关注的问题进行研讨。目前加入的民间智库有：福卡智库、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卓越发展研究院、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华顿经济研究院、远卓管理顾问、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等。其宗旨为“全国的问题，上海的声音；世界的问题，中国的声音”。

第3届民间智库圆桌论坛由华顿经济研究院主办，主题是“上海经济增长新动力”。

**主题：**上海经济增长新动力

**时间：**2015年5月27日（周三）13:55-17:00

**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大道2525弄5号A幢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议室

**出席人员：**民间智库代表：沈晗耀 张晖明 李 放

周伟民 姜永坤 谢祖墀 贾 彦 乔依德

**嘉宾：**周禹鹏 张天明

### 第一部分：专题研讨

主持人：**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院）：各位专家，各位同仁，还有各位媒体朋友们，第三节民间智库圆桌论坛现在

---

开始。今天的主题是寻找新动力，寻找上海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此次论坛的安排较前两次有新的调整，原先安排每人发言10分钟，再接着后面一个人开始讲，此次安排每人发言15分钟，发言10分钟，5分钟左右由其他人对其发言直接进行点评讨论，整个15分钟之后转为下一位发言，发言顺序为之前安排的那样。首先是我发言，完了以后是张晖明，再接下来是李放，李放后面是姜永坤，再接下来是王德培，再接下来就是乔依德，谢祖墀加在王德培的前面。这样以后我们按照这个顺序循环。第一轮发言就按照这个顺序，第一位发言10分钟左右，结束后对其进行评述、讨论5分钟，接着下一人发言。

专题研讨结束以后，休息15分钟，接下来进入下半场自由讨论，大家随意发言。首先由特邀嘉宾发言，后各位专家发言，同时媒体若有问题可以提问。以上就是我简要介绍的此次论坛规则的改变，现在正式开始。现在两点一刻，姜永坤来掌握时间，十分钟提示一下，讲完没讲完都到此为止，接着自由讨论再继续。

**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院）：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以科创中心为龙头，建设三大高地，打造世界一线城市。90年代以来，在四个中心和浦东开发战略性目标、旗帜的引导下，上海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近年来上海经济增速放缓，动力开始不足，进入了转型升级发展的新时期。未来上海发展怎么办？我认为首先应该明确转型的方向，确立升级的重点。我的个人看法，原来是四个中心引领我们的发展导向，到2020年原来设定的建设方案应该基本完成，距离到现在还有5年时间，当然一直到2025年乃至2030年四个

中心的建设也仍需继续完善。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现在我们整个经济的转型目标应该明确，应该向科技教育、医疗健康和文娱娱乐这三个方向转移，即目前上海战略建设的目标应以三大高地建设为战略性引导，同时继续四个中心的发展和完善，因此四个中心+三大高地（4+3）是我设想的上海未来发展的总体格局。从去年开始，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科创中心以来，建设科创中心是现在的热点，前天召开的上海市委全会也重点讨论如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和之前所提出的四个中心及我提的三大高地是什么关系呢？四个中心，尤其是经济中心向上发展就是需要研发来升级，科创中心是四个中心升级的必然要求。而三大高地中的科技教育高地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研发转化，就是科创中心。我认为应该以科创中心为龙头，带动四个中心和三大高地的建设。四个中心、三大高地和科创中心形成的三个环，科创中心发挥着龙头作用，引领作用。总体上前一阶段是四个中心为主导，后一阶段是三大高地为主导，尤其是科创中心是龙头，引领未来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何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我认为需要三个条件：第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成果，第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才，第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体制机制及运行模式或者平台。那么，现在环顾全球，硅谷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硅谷是什么呢？我的理解硅谷的本质是斯坦福大学的校园经济，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加上大学周边的校园经济。硅谷是从斯坦福大学原来33平方公里校园起步，后逐渐向外扩大，所以其核心是大学，外围周边是硅谷，是科技园区。大学是新兴产业的母机，周边的产业园区

（硅谷）是孵化器。总而言之，大学是当今国家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是未来前沿竞争的主体，不是企业。我们想想硅谷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都是斯坦福大学研究带动的发展，占据了国际竞争力的高地，所以大学是核心，周边是园区，这种大学+园区，即大学城模式是科技创新最有效的体制机制和运作平台。

回到上海，上海的科创中心应该怎么建设？我认为需要三大关键要素，第一是打造世界一流的研发型大学，而非研究型大学。牛津是研究性大学，我们要建的大学必须是研发型，即研究+发展+转化，大学周边园区是研发转化基地，不仅仅是研发基地，必须转化成产品，并使产品商品化，商品产业化，这样才有利润收入，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单纯的研究乃至研发大都是赔本的买卖，只有转化才是发展的生意。也就是说只有科技发现、发明的成果转化成为商品并盈利才是创新，否则就仅仅是发明创造。因此，第一个要点是研发型大学，绝对不是研究型。第二要汇聚国际一流的顶级大师，而不仅仅是国内一流的大师，若只是国内大师，那么也只是国内具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国际顶级大师才能有助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而习近平主席要求的恰恰是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第三需要做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成果。这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那么怎么样建立国际顶级的研发型大学呢？众所周知，梅贻琦，清华大学老校长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是正确的，但是只对了一半。在古代可能只需要大师，不需要大楼，但是现在产业化的时代必须要大楼+大师，所以研发型大学需要建设的是大师+大楼的组合。那么如何来进行大师+大

楼的建设呢？首先要有大师，那么怎样才算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顶级人才，又在哪里呢？人才当然遍布在全球各地，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有一个标志，那就是诺贝尔奖。若上海要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必须汇聚诺贝尔奖级别的人才，当然并不一定必须是诺贝尔奖得主，那些诺奖得主大多是七老八十了，而且也大多是纯研究型的。这是一个形象的标志，表明是世界级人才。没有这些人才，就不具有全球影响力，也就不是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学。聚集诺贝尔奖级别的人才，这是关键。我认为，上海要建设这样级别的大学应该引进100位诺贝尔奖得主级别的人才，同时要加上大楼，即实验室。建议根据上海和国家的产业发展确定10个学科作为重点学科发展，每个学科建立一个学科综合实验室，同时引进100位诺贝尔奖级的教授，每个教授配备一个小的教授实验室。这样一来，10大学科配十大实验室，100位诺贝尔奖级人才，100个教授实验室，这就是大师+大楼的大学。同时在周边建立硅谷式的研发转化基地，即科技研发转化园区，由此形成像斯坦福大学+硅谷的大学城模式及格局。按照周市长的建议，这样的大学城选址在浦东临港新城的滴水湖地区，那里本来规划了70平方公里的城市化地区，建议在那里打造50平方公里左右的大学城，中间3-5平方公里为大学园区，其余为生活区和产业园区，用15年左右的时间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觉得是不正确的，百年后，人都已经死去了，十年树木，肯定是不值钱的树木。应该倒着说，百年树木，十年树人，一个人从10岁到25岁，这15年的时间是树人的关键。清华大学1911年成立，20年代到30年差不多20年的时间就已建成为名校。香港科技大学也一样花了十几年

的时间成为世界知名大学，西南联大在短短的几年战争时间也同样成为了国内顶级的一流大学。因此，我认为大约10年-20年的时间建成一流大学完全是可以的，只有遵循了我所说的三个标准，第一，党的领导和政府更好的发挥作用，第二，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第三，根据科研规律，发挥教授治校、专家治校的作用。

如此大的项目当然需要很大的投资，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第一，要数十亿级的人才投资，一个诺贝尔奖教授需要50万美金-100万美金，再加上一个诺贝尔得主配备两个外名外国助手需要100万美金，再配备4名中国助手100万美金，采用这种市场化的办法，使这些人才共同来推进上海经济的发展。这一共需要投资10亿到20亿，相当于2公里左右上海地铁的建设成本，非常便宜。第二，数百至亿级的实验室投资，一个教授实验室投资1---8亿，100个实验室需要100-800亿。一个学科实验室投入10亿-50亿，十大学科实验室，也同样需要数百亿，所以说是数百亿到数千亿的实验室投资。还有就是数千亿、乃至上万亿的产业投资。这样一来，研发型大学上万亿的投资必将会带动上海下一阶段的大规模发展。上海最近几年的投资力度过小，只为6000亿左右，与重庆13000亿和天津11000亿相比，显然偏小。在发展的前期，上海的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比较大，现在基础设施已经差不多基本建成，现在的大规模投资正好应该从基础性投资建设转向三大高地等的功能性建设。现在经济增速趋缓主要原因是缺少投资热点，而大学城和三大高地建设恰恰可以创造巨大的投资机会。因此可用大投资来带动未来新一轮大发展。现在，舆论上不断宣传用消费带动增长，其实消费带动的只能是简单再生产，不会有新的增长，

要扩大再生产，要有新的增长必须是投资，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如何聚集人才？我还有另一个建议，设立中国版的诺贝尔奖。建议借鉴增设诺贝尔奖经济学奖的模式，由上海浦发银行、上海银行和全球华人共同出资设立基金，评奖学科就为天学、地学、生命科学这三个诺贝尔奖未涉及的学科，评奖完全按照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的规则运作。此外，建议建立全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如果全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建立在上海，那全球前沿的科学成果也将在这里聚集，到这里交易。交易中心可采用类似新三板的做市商制度，进行市场化、专业化运作，对专利和非专利知识产权进行市场化估值、定价和交易。这个交易中心可以和世界知识产权中心、美国专利商标局、欧洲专利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合作，建立面向全球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中心。

综上所述，我讲的重点是三个：一个是研发型大学，一个是聚集人才的诺贝尔奖，一个是聚集成果的全球知识产权中心，重中之重还是研发型大学，而非研究型大学。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我来说几句，你讲的东西都非常的高大上，但是我觉得建设上海创新中心需要对创新内容、创新对象的层次性做一些梳理。现在创新的概念有了，但创新的对象、内容还是一锅煮、比较混沌。你讲的诺贝尔奖层面上的东西，离应用还很远。上海真正的创新中心的建设，今天从发展方式转变、从经济转型升级，应该分为近期和远期。在近期最重要的是拿到适用技术，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比如最近成为潮流的互联网+，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是直接能应用的东西。刚才你的叙述所指是以后20年后30年后用到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在你的话题

下，找到一个能够对接远期和近期的认识体系，我提这点讨论意见。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我对你（沈晗耀）的发言有一些评论，你发言的内在逻辑不是太清晰。你说硅谷是因为斯坦福大学发展起来的，这个结论值得推敲。当然，斯坦福大学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是不是就是因为它而发展的，这个我们不知道。还有一点我也不明白，如果上海需要建研发型大学，那斯坦福大学是属于研究大学还是研发大学？如果是研发大学，那你需要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那么 MIT 或牛津是研发大学还是研究大学？我不明白这里的研究型大学和研发型大学的区别。另一点我也同意张晖明讲的，诺贝尔奖和你之前讲的东西逻辑关系不是很明确，乔布斯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比尔盖茨也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那这个科创中心是要搞基础科学还是科创？而且我个人觉得没有分为研发和研究这样说法的，有研究当然有发展，都是在一起的。

**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院）：我等一会儿再回答大家的提问，请下一位发言人先讲。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我的发言题目是：梳理科技创新的内容，明确创新主体分工，培育创新合力环境。

今天在这个背景下，讨论这个“上海发展新动力”是很有意思的。我的理解，首先，市委颁布的文件是就前期对“科创”这么大讨论聚焦的情况下，就建设科创中心本身提出大概 15-20 年的一个对接近期和远期的纲领性原则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期待后面 8 个还是 9 个配套性的文件落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在落实。

我想讲三个观点。所谓“动力”，在市委文件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叫“策源地”，也就是动力源问题。策源地，第一个需要辨别的是什么是源；第二个是创新内容的体系性问题，包括创新主体、多主体之间的相关性问题。今天我们都说市场、企业是主体，没错，那是针对技术研发应用、产业创新而言，企业是主体。其实在整个创新行动中，政府也是很重要的主体，政府是塑造市场环境的主体。在这个环境中，企业是市场活动的主体。所以我认为应该对创新内容、创新对象和创新主体的体系性和相互之间、功能之间的关系做些梳理，这也回到了《决定》中提到的体制、机制问题。第三个是多主体之间、多要素的创新内容之间如何形成 $1+1>2$ 的综合的整合效应。

首先谈动力源，我觉得有几个在基础理论认识上的改变。一个是对科技工作、创新的源头是什么？创新的源头是市场需求，是创新者对利益的追求。韩正书记多次讲过，要让科技人员“名利”双收，实际上就是回归到经济学研究中的理性问题，是对个体理性的尊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观念的改变。我认为动力的源泉是观念的改变，这些观念的改变涉及到一系列在体制机制内容和设计依据，比如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今天我们在经济理论方面，对公平效率关系、对市场经济体制构造中政府如何定位也是一直在争论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已经讲过，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举个例子，近期的科创中心大讨论中，上海人事局现在已经开始表态，只要拿到创投的科技人员，就能拿到上海户口，这是一种政府的认可行为。也就是从原来的打分方法基础上增加了新的评价认可方式。实际上这丫还仅仅就是政府的“认可”而已。我们再看上海的人口结构，看上海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

口，没有户籍在上海生活的人群数量差不多是与户籍人口相当，其中相当一部分有长期居住证。进一步细分不难发现，各类人都有自己各得其所的市场选择，没有上海户口的人照样可以在上海生活。政府没有给其户口只是考虑到社会成本，如社会养老保险金，所以即使没有上海户口的人，只要在上海找到各得其所的生存空间，他就能够在上海生活。政府承认他的户口只是承认他的社会待遇，如小孩的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的问题，这纯粹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协调过程。需要强调的是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问题，就是需要对创新的哲学本质有效清晰地认识，“创新的本质就是违规”。规可以是法律可以是条例，也可以是过去经验成熟的某些政策，甚至是对权威人物的冲撞。没有这种突破，不可能有什么创新。佩雷斯在任以色列总理时特别强调这些，就是鼓励敢于冲撞权威，这就涉及到对现行规则的适用性与创新可能对现行规则的冲击之间的关系的处理问题。这是在观念上必须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接下来是创新体系内同的多样性。政府是非常重要的主体，企业是很重要的主体，科技人员是很重要的主体。我看到“赛先生”微信平台上的一篇文章，是施一公写的，其中指出企业是主体我同意，但是我作为科技人员，也是主体，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对不同主体，不同功能，不同主体相互关系进行讨论，加以澄清，乃至来检讨现有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要素有多样性，要素主体也有多样性，要素主体诉求也是有多多样性，这个问题必须要梳理清楚。加入我们拿针对政府的事情来说企业是不对的，拿针对企业的事情说政府也不对。这就是说，绝对不能忽略每个主体各自发挥的作用的客观存在，在此基础上关注如何整

合，这是非常重要的。沈老师刚刚讲的很多是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科学创新是文化创新，诺贝尔奖的东西有些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应用。我们需要理清楚，科学创新、技术创新、技术转化应用的创新乃至产业模式的创新，商务模式的创新表现为多个层次，对这些层次展开关系需要搞清楚，创新内容的体系性、层次性必须要梳理清楚。因为科技创新的最终成果是改善人类福祉，造福人类社会，所以这样说来归根结底还有一个消费创新问题，如果消费者不接受这个创新，那也是没有意义的。我很推崇大唐电信提出的“七化”，叫“创意课题化，课题成果化，成果产品化，产品产业化，产业规模化，规模市场化，市场国际化”。这是一个研发型企业完整的工作机制，创新是一个体系，来自科技人员对生活的观察，对新文献的阅读，在观察和阅读基础上的思维和思考，乃至他开始有创意，设立项目，等等延展。

第三个观点，如何处理创新主体、创新内容的层次性问题，如何形成合力。过去我们特别有产学研、政产学研的概念，完整地说，叫“政产学研用”。各类主体的行动，围绕创新的动作，如何互为支撑而不是相互摩擦，形成合作放大效应，从而造成动力的加速度。我认为动力是立体建构的，核心的是人和观念；延展开来，受观念支配，观念指导、驱动行动；在此基础上，延展至市场活动圈层，人和合作交往，是市场；而市场又是在一定的体制政策环境下运行的，环境是政府创造的。我认为动力加速度应该整合多主体之间的，多工作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 $1+1>2$ 的结果。这是我讲的创新的圈层、以及圈层之间相互关系的有效整合，从而造成创新加速的效果，以市场选择形成有效分工，放大合作成果效能，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动能力量。

**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院）：关于他说的政府和市场、多主体的提法，我非常同意。社会中有很多不同的主体，政府是主体，学校也是主体。现在有一个讲法，政府职能是裁判员，不能是运动员，这个是要看范围和界限的。一个省下面的各个地级市之间是竞争关系，政府是主体，对于市下面的个体，居民，企业、公司，包括事业单位，说，它是裁判。国家也是如此，国家对内是裁判员，到了国际上就是运动员，还要当教练员，更要争取当裁判员，比如进入一些国际组织，有一些发言权，所以要看范围，参与竞争了就是运动员，最好再是教练员，组织各种资源参与竞争，但是在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必须是公平、公正对待境内的各种组织，各种机构，我特别赞成多主体的观点。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你这个发挥的好，讲的非常有道理。

**李放**（远卓管理顾问）：我个人前面讲的在上海怎么落地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说人是最核心的，观念也是最核心的，还有待时日，可能在本期内跨越式的解决问题是困难的，之前讲的都是高大上的东西，如何找到机制体制走通的路径，这是最关键的。

那么我接下去讲。上海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个产业的主导地位变化也很明显。实际上，分行业角度看，金融业发展速度最快，这里面有个其他，其他里面包含很多很多产业。制造业结构比例下降，但是绝对额是升高的，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上海需要从顶层设计来考虑整个产业安排。现在我们讲不管是四个中心的建设还是什么，最担心的是旧中心建设和新中心建设互相之间的关联问题，以及落实到上海新的增长动力的问题。

实际上，金融业的发展本身实际上和上海产业有关，也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和上海产业无关，如有些要素市场，所以单从这一块来看，对上海发展的帮助又有多大作用呢？那么我们觉得需要对以下几个问题搞清楚。第一，金融业对上海能有何种进一步的贡献？第二，金融业对上海的其他产业能有什么样的带动作用？我们这里更多的是从金融业的角度去讲的，刚才大家讲的最多的是从科技创新角度去说。第三，上海的制造业虽然总量仍然在上升，但结构比贡献在持续下降，上海除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外，其他制造业何去何从？那么，上海原本在国内具有领先地位的产业如何定位？以什么样的方式定位？那么，上海的科技创新中心如何发展？这个中心和金融中心及上海的现有各产业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问题，上海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平均年龄、平均文化程度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将如何适应性调整？

我先从最后一个问题开始讲，前段时候，人事部有个非常有意思的讲法，现在我们的就业需求非常非常旺盛，好像就业根本就不是问题，但是未来结构性失业问题却是越来越严重。上海不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有一批产业人员被挤出以后，实际上他们需要找到新的工作不是很容易，合适的这样一个工作不是很容易。进一个角度来讲，因为作为一个城市，我们不能单单讲经济发展，还要讲社会，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保持比较好的人口结构、群体结构，那么上海到底是把自己定位的社会结构是怎么样的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呆会我会呈现一些比较老的数据或是不太完善的数据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那么后面，作为远卓的观点，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实体产业对于中国来讲，对上海来讲，我们认为还是非

常重要的。刚刚我们看的产业结构的数据里面，金融业产业的占比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其他的增长，相当一部分还是靠实体产业的增长。从这一角度来讲，怎么样将金融、创新和实体产业相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创新中心离开实体产业将会是孤零零的。刚刚我们所讲的全球知识产权的交易是一次性交易，它不是一个持续性增值的产业。如果我们的优势在于要素市场在全国的交易，而这些对上海本来的产业，本来的优势产业没有关联的话，实际上会浪费很多上海的产业资源。

今天上午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很高兴。上海绿地、上海建工和某家信托公司共同组建了一家 1000 亿的，专门为轨交 PPP 的投资基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上海建工，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建筑行业里面来讲，除了中建和铁建之外，可以说是一个王牌公司。上海的建筑大军里面，它的专业技术，包括很多新的技术，都是拿到项目和院校合作这样来联合攻关。就是说，这些要素的组合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的想法是不求所在，但求所以。实际上，之前上海的轻纺业在全国是非常有地位的，后面早早的就抛掉了，我不是说在抛掉了之后再捡起来，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已经有的，已经有产业基础的，而且研发能力又这么强，上海又有这么多大学作为它的后盾。我们的创新中心单单就只是搞科技创新，我们也走了很多孵化器，也走了很多所谓的创业园区，实际上现在存在这样的现象。政府扶持什么哪个行业，哪个行业就会发展，因为有大量的这种是按照政府的意思来落实的，大量的园区都是这样建成，我之前是参加了上海的某些地方的专家评委弄了好多好

多这样的项目。一看就知道，有些项目就是这儿弄个园区，那儿弄个园区，这样的东西，当他没有产业生命力的时候，企业待着这个创新中心里面也是没有价值的。他们的存在，存在的价值，这是需要市场来检验的，最好的方式是根据产业和创新中心进行衔接，产业和科研的结合，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城市，要承载一般制造业是不可行的，生活成本，社会成本，整个的成本那么高，是不可行的，必须要组建2个中心是必要的。经济中心要，研发中心要，怎么能够把创新和产业，创新和金融很好的结合，这才是重中之重的事。

**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院）：你的十分钟到了。

**李放**（远卓管理顾问）：好。那么，后面我就讲一句话，看上海10年的数据，我们的常住人口的平均文化程度是初中以上，怎么来实现跨越式的、巨大的挑战有待互动调整，我就不多说了。

**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院）：因为时间关系，本来你讲完大家评论一下，然后他讲，现在因为他要先走一步，那请你先发言。

**谢祖堃**（高风咨询）：不好意思，我尽量简洁的讲一下我个人的观点。我可能和各位在座的领导有点不一样，第一，我不是上海人，来自香港，回到内地有超过20年，这20多年时间里，我都是在国际顶级的管理咨询公司工作，在波士顿，博世里面都是大中华区的领导者，这些经验都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见解。首先，我的工作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华区这一块，但是呢，同时我的公司以及我的同事，都是外国人，而且可以说在全球都很有学问。在过程里面，作为一个中国人，同时作为一个全球公民，对于今天这个话题我会有

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它。

第一的话，我很理解大家为什么都非常关心上海的发展。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调过来看问题，不要永远的说上海市应该做什么。上海市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阶段，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我们完全可以从全球的角度看问题，就是说 global 的角度来看，从全球高端的角度看。我刚回国的时候，国内的发展你们应该比我知道的清楚，国内道路状况不行，还没准备好，过了 20 几年，或者说我们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个人觉得，包括和我的客户，一些跨国公司和很多本土企业都认为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世界商业创新方面的中心。我们中国人都不理解，可能不接受，可能也不会发现我们自己的问题，实际上是这样子的，这种成就我们需要肯定它，当然也是存在很多问题。当然我的建议是首先从国际上看问题，从国际上回到中国，中国回到上海，这样去看问题，我觉得会比较好。

刚才沈院长和张教授也已经提到很多关键的一些概念，我想我可以提一下我对这些概念的理解。第一呢，硅谷是一个很成功的创新中心，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它也不是完全靠的民间力量。硅谷的发展来自于它的学校，大学，来自于它的投资者，尤其是所谓天使投资者，VC，风险投资者。还有呢就是因为创业家、企业家在里面，这是对的，它形成的一种信誉在里面。同时硅谷也有，美国政府在里面，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加州政府很强大的力量在里面。举一个例子，美国的 NASA，不知道内地是怎么翻译的，在香港翻译是太空总署，NASA 是一种国家行为，美国人所谓道月球，没有国家行为是做不到的。其实国内也是，国家能力也很强，我个人意见是这样，一方面要鼓励民间力量，允许民间创新、

创业精神，能够不断产生，但是坦率的说，没有中国政府过去 20 几年作为指导民间企业家发展，民间企业家进步的方向，马云、马化腾、雷军他们自己找出来的，当然，他们有一个很关键的条件，就是政府需要去注意的，这些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往往会碰到在政治里面所以的灰色地带，这些灰色地带就是要看我们如何去处理企业家的行为。假如我们很极端的就去否定他们的行为，马云就不会创业成功。但是我们也不可能给他们无边界的无监管，需要一点监管的，这其实是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因为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聪明的，很灵活的，中国的市场比全球的还要大，比美国的市场大。

我个人觉得，从很多我的客户中了解，无论是美国公司还是中国公司，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已经不必硅谷公司差，或者说是甚至超过他们，这是要从政府层面去肯定的，我的理解是习近平和李克强。他们想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我们提到的上海市政府究竟要做什么？我觉得其实也不需要做什么，你需要给它一种环境，其实上海市的条件已经非常好了，包括我自己，我当初为什么要来中国？当时我在 VC，我在波士顿，我们选择来上海，当时我们是国外的、全球的第一家国际性的经营公司到中国来。我们到哪里，我们到上海，因为我们觉得上海市能够支持我们，波士顿现在在中国也做的不错。上海有很多很好的条件，我们要把这些好的条件，举例来说，居住环境，很多跨国公司已经在上海落地，好多不愿意去北京、不愿意去广州，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去，就是要来上海，为什么？因为上海有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居住环境，学校、国际学校等配套设施做的比较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过分的去说我们哪里有做的不好，我们能够给与，不管是跨国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让他

们这个环境中发展，我觉得这已经足够了。因为这些创业家、企业家是很聪明的，能够找到自己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里还有不足，我建议上海市可以做几点。

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也知道，北京，我和北京中关村那边也有合作，中关村也做的很好，深圳也做的很好，现在杭州也做的很好，大家都知道。杭州在这方面其实已经超越了上海，虽然上海在过去 20 几年都不断在说我们要发展什么，我们要做什么中心，我们要做什么，而杭州就是默默的去做，就做成了，这也是有原有因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也不需要讲的很白。其实有些时候无为就是有为了，无为还是有为的，只要你去允许这些创业家有去试错的机会，因为创业往往不是第一次就做成的。雷军想做小米就做了很多次，如果小米的第一次尝试都不被允许的话，这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我想在最后介绍一下用思考的方式成立高风咨询工作室的原因是什么，在国际顶级的经营公司中，可以说我是全世界最顶级的华人顾问，毫无疑问的，我是高级合伙人，是博世里面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我是大中国区的董事长。我离开这些公司是因为什么，我认为这些老外的咨询公司，在中国很可惜，他们做的不好，他有一定原因的。我们希望能做到，就是用刚开始我说的一种做法，一种眼光。我觉得，现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整个国家发展到了很高水平，但是在知识型行业里，就是 know ledge-based industry, 包括我们中国所谓的智库，我们在国际上没有一家能够称得上是顶级的，没有，包括社科院。但是我觉得我有这样的机会，至少在管理咨询行业，能够建立一家全世界顶级金融公司，能够和国际顶级金融

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争得一个席位，而且我们一定会成功的。但是我们公司的分局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根就只在中国，但是范围遍布在全球。用全球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业务，无论西方的经营公司无论规模有多大，都不能和我们竞争的，因为他们根不在中国。为什么根在中国这么重要？因为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世界在商业方面创新的源动力，源泉在我们这边，所以根不在中国，就做不成全球顶级的金融公司，顶级的知识型公司。这是我们的看法，高风是这样的预期，我们是全球公民，但是我们也是植根于中国。这种定位我认为也可以俯视到其他领域，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在什么行业，我们就争取在全球里面有一个顶级的地位，但是，因为我们根在中国，我们比其它地方更有竞争力，而且生存率会非常高。在我们成立一年多的时候，很多客户，包括很多跨国企业和本土企业，都来找我们，因为他们认同我们的定位。

最近我们完成一项研究任务，这份工作是芬兰国家政府委托我们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很多创新，无论上海也好，北京也好，还是什么地方，都做的非常好，而且中国的创新机会非常大。从芬兰政府角度讲，他觉得这对他们来讲有无限的机会，尤其对芬兰一些中小型企业包括大型企业，所以他们委托我们做了这项研究，也就是说中国创新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对于芬兰公司企业来讲机会在什么地方？其实这种想法，不单是芬兰这个国家，我可以说我们接触很多其他国家政府，欧洲，美国以及以色列这种国家，他们非常非常希望能和中国一些企业合作，利用这种创新为他们创造新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是有很多发挥机会的，我刚才也说过，上海是全中国最国际化

的城市，当然除了香港之外。我们很多企业家创新家都愿意来上海，很多中国很成功的创新公司或多或少都和上海有关系的。

第三，国际角度来讲，中国创新有一种无比愿望，如果从上个世纪的角度看的话，中国未来的机会将会无限多，我不觉得我们应该从刚从你们所说的科技园、产业园开始，从硬件角度看问题我觉得是一种过时的方法，应该从知识角度看待问题，也就是说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用英文讲就是 *thought-leader*，意思就是知识与意见的领袖，我们要成为知识与意见的领袖。中国有很好的机会，上海有很好的机会，我们不是一定要硬件来赢对方，我们以软件来赢对方，这种软实力的源泉在于我们的 *thought-leader* 式的知识的掌握，对新知识的掌握，然后我们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向全世界传播，让全世界人都很佩服我们，这样，我们就会成功的。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

**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院）：好的，那下面大家对李先生和谢先生发言有什么评论和讨论？

**姜永坤**（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我补充一点，谢博士呢，之前是博世大中华区的总裁，是发展中心特聘的国际智库专家。

**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院）：接下来就是你（姜永坤）讲。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我们对比较熟悉，他也是这个圆桌会议的发起人方之一。他也比较忙，实际上也出示了一些研究成果，实际上他们在企业战略管理是比较擅长的，我们以后有机会也可以进行合作。

**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院）：你接着讲。

**姜永坤**（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今天的题目是上海经济增长新动力，上海现在正在部署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所以我今天想从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这两个话题相关的角度来谈一点认识和建议。

各位下午好。我的主题是，在科技创新战略引领下，以需求为导向，依靠新技术促进新增长。首先，从世界各国转型发展进程，特别是发达国家城市经济体转型过程中看，进入后工业化社会阶段，影响增长主要有这么四个因素。第一个是内生技术创新，第二个高新人力资源的再开发，三、四是制度创新和发展战略创新，从而有助于激发技术潜能，整合创新要素，促进经济社会结构高水平的持续增长。

刚过去的市委全会，相信大家都比较关注，会上对上海科创中心进行了战略部署动员。我觉得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扎实落实、怎样有效实施问题。借此，对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谈两点战略性认识。一是应考虑中央的国家战略与上海的地区战略如何实现紧密契合，不应该只是单一维度的国家战略落实思路，应该有一个创造性的地方战略的契合；二是科创中心建设和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不是“4+1”简单的概念和功能叠加，而是有机的融合，应是以建设科创中心为引领进行全方位的覆盖和全方面的渗透。我们在实施中只有用战略思维，尊重市场规律，讲求战略战术，实施点上突破，面上示范，形成点面交织，才能激发科技创新浪潮，促进经济新增长。这是一个基础，是我下面讲的增长的一个前提，要有这个战略思维意识，就能事半功倍。

第二点前面我已经说过，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增长靠的是这四个要素，那么技术创新理论，刚刚张教授也已经讲了，我知道，张教授也有著作的。实际上，无论从理论和实践，

还是从世界各国的经历来看，都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那么技术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什么呢？归纳起来，主要的是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当然，科学创新的主要来源还有一个是个人兴趣。我们都知道，做研究个人兴趣是很重要的动力，这个今天就不展开讲了。

回到科技创新的主动力是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有句话说，需要是成功之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从需求导向和实施中的产业创新维度提几点建议：

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贴近大众需求，迎合社会终端消费需求出发，先行聚焦若干上海有基础有条件有消费前景趋势的产品和产业，通过政策支持来实施点上突破。我在这里说几个大家可能觉得不是高大尚的。马桶盖的事件，大家都应该是知道的，现在很多日常消费品里面涉及到高科技的东西。我觉得上海有几个东西，一个电动汽车，上海汽车搞了这么多年，应该说引进吸收再创新是一个主要方面，但是很可惜，上海应该想想，中国的高铁成功是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最好的例子。上海的汽车发展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就是走不出这条路子呢？现在各种条件都足够了，肯定是因为有什么障碍阻挡着。电动汽车制造业，应该来说上海应该做的出文章的。

再一个，大健康产业里面有很多东西，时间关系，就不展开讲了。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老字号民族品牌，包括中医药、手表、照相机等，这里的每一个都非常贴近社会的终端消费，都可以通过技术革新、注入新材料新工艺，实现这些产品的智能化、绿色化，再制造再开发，成为上海新的增长点。不但可以拉动社会最终需求，而且可以弥补上海在战略性产业尚难以接续时期的产业空白，这是贴近大众消费需

求一块。

二、应该以创建创新型城市为引领，选择若干具有条件和区位优势比较适合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和高校聚集区，通过综合配套政策来推动他们向科技新城城区转型，将这些高新区和周边的大学打造成产业智能化，创新网络化，功能社会化，环境生态化的科技新城。比如硅谷，形成科创性城区的模式，从空间上推动产学研区内一体化，可以有城中型的，也可以有城郊型的，形成上海的科技创新产学研地域和空间上融合的面上示范效应。

三、现在上海科创中心发展已经定了方向，目标也已经有了，但是在追求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上海要放眼全球，明确提出对照美国，实现赶超。上海的优势，我很相信刚才谢博士说过的话，已经具备了追赶的基本条件。为什么要对标美国？因为当下国际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科技带动生产力的竞争，其中做的最好的就是美国，所以上海应该有这个雄心胆略对标美国，着重研究借鉴它的体制机制法制，逐条逐项地对照，再加上博采英国、德国、日本等众长，实现为上海所用。相信只要是公开的有规则的赶超，也有利于中美两国实现良性竞争互动，一起带出比较低迷的世界经济，这不仅会造福中国人民，也会造福全球福祉。

四、科技创新有风险，要投入，应该与金融创新紧密结合，比翼齐飞，形成二级火箭，强力助推上海经济发展。经验表明科创没有金融创新强力支持不行，上海应该借鉴前几年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基础和各种各样的新型式，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使科技服务里面包括风投、创投、保险、融资租赁、金融租赁等金融机构服务平台在上海有个大发

展。上海应该有能力做好这个事情，科技性的政策银行都是可以设立的，苏州等地已是有先例的。像美国的硅谷银行，上海是否可以从现有的银行里面突破一下，如使浦发银行里面的对口部门进行转型，不要仅仅是以一个银行的一个部门或一个科的身份来做这个事，受到很多的制约和局限，我以前开会接触过这样的部门。如果有科技政策性银行，相对独立地真正的贴近那些创业者，贴近大学科研机构，成为起到国家政策扶持直接作用的杠杆桥梁，这样一来，就有助于更有力地形成上海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相结合，共同带动产业发展的浪潮。

还有一点，在消费服务需求带动下也有一个环境建设问题，我们前几年主要放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上，这没错，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许多区县的居民感到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与大众需求有差异，发展相对不足，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上海要提倡实施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手并举，来营造真正的宜居、生态、绿色、智能的和谐社区，提升上海的生活服务质量，创造一个便利便捷的生活服务环境，这样不仅有益于促进城乡消费的兴旺，促进社会安康，也有利于上海 2020 年按照中央的目标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小康社会的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上海打造科技创新宜居环境，吸引高端人才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最后一个是法治，这里不展开。凡是上海地方性的法规可以涉及的范围，包括知识产权，还有涉及的融资租赁法，都应有探索，先行推出。

总之，我认为，在目前市里科创中心建设发展大的纲要已定的情况下，要用战略思维来组织战役上的突破和先行，形成点面互动，和经济增长形成相辅相成，互相推动，成为

推动上海转型发展的内生力量。谢谢大家。

**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院）：大家看看对他的问题有什么讨论或提问。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没有要不就继续。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破除三重魔咒，坚持双轮驱动。”魔咒就是指错误的概念，它束缚了你的思维，所以叫魔咒。“双轮驱动”，这个周市长也知道，我们以前也提出来过，一个是先进制造业，一个是现代服务业。我等会儿会讲到“科创中心”与“双轮驱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所谓“三重魔咒”，第一个，刚刚谢总也提到了，报纸上经常反反复复说，“为什么上海出不了百度，为什么BAT不是上海的”。刚开始领导提一下，这个也好，我们也有很多地方做的不是很到位。但是讲的太多，我认为就会形成一个魔咒，会束缚你自己，好像每一个城市都要出一个因特网的大户，才能说明政府做的好，这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

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原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到武汉去做报告，有人让王书记介绍阿里巴巴能出在杭州的原因，武汉能学什么，能借鉴什么？我觉得他的回答就很好。他说，要出什么企业，我们政府是不知道的，也无法预见，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经商环境。这个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很有道理。可能刚才谢总想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包括他讲的自己，以及为什么很多公司到上海来，是因为有很好的环境。这个环境不单单是经商环境，也包括生活、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出什么，就出什么。不是你哪个人想要出什么，

就能出什么的。有很多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结合在一起。

这里我也举两个例子。大家也知道金砖银行落户上海，两周前巴西的一个副行长到上海来，我请他吃饭，聊天。他来之前，我刚好到美国 IMF 开会，中国驻 IMF 的朋友跟我说，“有个同事要到上海来，你最好招待他好一点，因为他太太不放心，不太愿意到上海落户。”我说：“没关系，我尽地主之谊。”最后一天我请他吃饭，到鼎泰丰吃小笼包，因为上次开会的时候，巴西驻上海的总领事就讲上海的小笼包好吃。我说很简单，就吃上海小笼包。虽然它不是正宗的上海小笼包，当然性价比也不怎么样，四五十块钱才很小的五个，但是他很满意。后来我就问他：“现在能否决定到上海落户？”他说：“好，上海非常好。”我说：“是不是很像你们的圣堡罗？”他说：“上海比圣堡罗干净多了。”他后来还跟我说，以前有一个巴西公司的管理人员来上海，后来到期需要回去，但是他不愿意回去，就留在上海自己经商。他跟别人讲：“我遇到的来上海的巴西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喜欢留在上海的。”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为什么有时候会发现上面批评上海的比较多？因为说你好话的人不愿意公开说。我认识一个从美国回来做投资的民营企业家，他私下跟我说：“我全国什么地方都有投资，但是说老实话，投资环境还是上海好。”他举了个例子，南通让他去投资，但是去了之后就开始关门打狗，甚至有的去了之后，宁可受损失业要退出。

**周禹鹏**（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我可以插一句吗？我也找了很多民营企业家，包括新创业到上海来的，以及二次创业到上海来的。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到上海来创业。他们跟我讲了很多，然后我把这些概括成“两个三”。对于到上

海来的企业来说，有三条最吸引人。第一，信息。因为信息背后就是资源。第二，人才。别的地方他找不到这些优秀的人才，当然不是指上海人，而是指全国到上海来的优秀人才。第三，法制。相对来说，上海的法制环境还是比较公平、公正的，这个很重要。一旦没有公平、公正的环境，那肯定是不干了。所以我把它概括成这三条。

那么那些成功挖到第一桶金的人，又为什么要到上海来？我又把它概括为另一个“三条”。这些人二次创业，大约40岁左右。第一看重上海的教育质量，因为他们有孩子了，需要读书。第二看重上海的医疗资源，因为人到中年了，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病，上海可以说是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的集聚地之一。第三，文化。到上海来他们可以享受到很多文化，这个文化是个大文化概念。所以他们二次创业很愿意到上海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对。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要破的魔咒。要看到自己的优势，做好自己，把环境做好，包括生活方面等等。第二个魔咒，就是我们在概念上的错误，就是一些与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的不恰当比较。要学别人是肯定的，但是我所说的不恰当是指没有看到上海与这些大都市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我们城市的结构与纽约伦敦是不一样的。我们有很大的郊区，有近6000平方公里，而纽约则很简单，就几个区。所以我常常看到报纸上一些让我很恼火的文章，说上海金融的就业人口占全市人口百分之几，不如纽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多少。不能这样比，因为我们包括很多郊区。我最近看到周其仁的一个讲话，他说静安区每平方公里创造的GDP根本不低于曼哈顿。所以这是一个不同。

第二，别人是完全市场经济，我们还是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我们中央跟地方的体制是不一样的。我们做了这么多规划，包括2030，2050等，我没看到有一个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会怎么变。不能完全把上海市当作一个独立的城市，像纽约一样来做。所以，你比较可以，但是你要正确地比较。

第三，我觉得上海有时候过多地考虑本地原住民的利益。比如群租，就是讲负面的东西，影响别人休息不好等等，但是群租中说不定就有创业的人。现在我们很机械，谁拿到风险投资了就让他落户口，马云来的时候也没拿到风险投资啊。所以，这就需要比较宽容一点。有的时候不要过分得强调整齐规划，这个东西是不行的。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群租就是为了降成本。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下面我要讲的还是老话——“双轮驱动”。“科创中心”这个上海一号课题，有那么多人弄，我想我的智慧超不过他们。但是有一点，就是你们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它落地要落什么地方？因为科创中心，不是你拍脑袋想一个什么东西，发明一个公式，提出一个技术理论就行的，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还是要落地。刚才也讲了上海有郊区那么多地方，先进制造业怎么升级？我再讲一条，就是不要一风起。比如“互联网+”，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还有工艺改造、材料提升等等好多东西。

当然我也在想，我们还要总结一个经验。周市长也知道，我们十年以前就在讲“科教兴市”，那为什么过了十年现在还在讲？说不定再过十年又有另外一个口号，比如“攀登科学高峰”什么的，又要讲。我们要总结总结，为什么那个时候提了，到现在还没做到。我想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

个是客观，如果你产业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单提科学也没有用。举一个例子，我们国家在某一个领域取得突破的事，在五六十年代都有，比如人工胰岛素。

**周禹鹏**（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所以我觉得习总书记这次讲的“科创中心”这个概念要好好地研究。这不是简单的科技中心，研发中心。它应该是依托于科技的发展，研发的发展，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创新型的产业。所以它叫“科创中心”。这是我在想习总书记用这个词的原因。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科创中心也好，科技中心也好，都要达到一定的基础，才能推动。比如我之前举的例子，我们发明了人工胰岛素，但是有什么用啊？没有，只有在回忆历史的时候讲一讲，它没有推动产业。现在一定要推动产业，有些东西尽管不是最先进的，但我觉得也要考虑。比如，现在报道的“环同济研发设计服务特色产业基地”就搞得很好，也许没有什么太大的新发明，但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啊，它推动了一个产业。

另外有一个关于质子医院的报道，我就觉得有点过分，有点不对。我一看以为这个质子医院是自己创造的，但其实不是的，是从西门子那里买来的。当然，就算是买来的，自己装起来也不容易，但这个毕竟不能算是科技创新。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算应用创新。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对。应用当然不容易，你报道也可以，也是好事情，但是你不能把它归到这科技创新里去。所以我觉得怎么落地很重要。

第二个要落地的就是现代服务业，我要讲的是金融这一块。刚才李放也讲了，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产业增加值中，金融占了很大一块。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金融可能还是在起步。拿全球来说，最近有一个报道说美国和日本的金融可能已经过度了。我们国家还没达到这个程度，所以你要发展金融。既然国家已经认定上海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就要下大工夫。一块是互联网金融，我就不说了，大家都会走。另一块讲的不太多，但是我觉得上海要下定决心抓先机的就是涉外金融。从大趋势以及很多人的讲话中，我们看得很清楚，资本账户已经要慢慢开放了。国际金融中心没有资本账户开放是成不了的。中央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所以我觉得上海要抓住这个东西。在自贸区要多建立一些金融平台，让人家出去，我们对外投资就会加速，这个大趋势很明显。那么我们在涉外金融方面，能不能多做一些事情？包括一些对接，一些咨询公司，利用自贸区建立一些平台。因为其他地方暂时还没有办法跟我们竞争。

我们自贸区搞了一个 FTA 账户，广东也在搞，跟上海不一样。但据说广东那个后来被否决掉了。所以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把这个事情做好，能够领先别人一点。我也知道上海有很多单位在很努力地做，比如最近上海交易所要成立一个新兴产业战略版。一年多以前他们就找过我们，他们很着急，他们知道创业版的前景会火的不得了，但是因为创业板都在深圳，他们定不了。

**周禹鹏**（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我原来也想说，我们都是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我们有股权交易中心，但就是没对接上去。为什么不花功夫去打通？我们还有个联合产权交易所，原来都是走在全国前面的，现在越做越小，变成做不过人家了。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有些时候讲“我们不

要政策洼地，要制度创新”，但是创新跟政策是不能分开的。制度创新有概念上的东西，但有些还是要由政策来保证的，不能把它割裂。好了，我就讲这些。

**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院）：好的，大家有没有简单的评论一下？然后就休息。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我评论一下，我完全赞成接地气。然后打破三个魔咒，其实魔咒还不止这些。其实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概念下，就有很多误解。我有过一个研究，只是还没有发表。我觉得上海现在只是游行在一种概念上的创新，接地气都不够。关于先进制造业，十二五时期就强调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误导了很多。原科协主席郭重庆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只有先进制造，没有先进制造业。我觉得这观点是对的，我是赞同的，我有很多观点可以证明的。

现代服务业里的金融，不知道现代和传统之间，是以什么来识别的。金融如果按时间概念来说，它是最古老的一个行业，1647年英国就有信托，金融就出现了。所以用时间概念为主也不对，用工具概念为主也不对，即使是就某一个行业产业类别的对象来识别，也不对。你说餐饮业是传统服务业吧，但是这概念也不准确。海底捞是典型的现代服务业。它现代在什么地方呢？人性化。你在等餐，它给你剪指甲，涂指甲油，擦皮鞋。这就是让你觉得窝心，让你觉得自己本来就是接受服务去的。但是它是餐饮，而且它做连锁。它是标准化能力在提高，一般烧烤是没有标准化能力的。但是它这个火锅，你自己调总价，自己调口味，口味是自己可以选的，已经完全被标准化了。所以我同意你的接地气，要落实在产业里，落实在项目里，落实在体系里。

就像周市长讲的，某些金融产品类别要千方百计得把它打通。那就会有  $1+1>2$  的效果。

**周禹鹏**（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我插一句，讲到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当然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概念了，比如两个轮子一起转之类的。但是国际上的产业分类是没有现代服务业这一个概念的，只有服务业、制造业、采掘业等等，我们讲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我们从来没有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什么概念，边界是什么？很坦率的，本人也讲不清楚。但是讲不清楚也有个好处，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放，往里装。在讲到现代服务业这个概念提出，我的记忆里大约是 04，05 年，当时我还在政府，那个时候是在搞十一五规划。当时锦涛同志到上海来，讲了这么一句话：“现代服务业是上海的短板。”这应该是对上海的鼓励鞭策，不能说是批判吧。所以当时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就提出现代服务业的建设。我到了联合会（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之后，把匡迪（徐匡迪）同志请过来，他在会上讲的是高档服务业。他认为上海应该重点发展高档服务业。

那么我们现在所讲的现代服务业，我更加偏重于现在的信息化手段与服务业的结合。银行是现代服务业吗？300 多年前就有银行了。但是现在的银行与那时候的银行是不一样的，信息化的手段，服务能力完全不一样。

我在跟你们举个例子，你讲餐饮，那我就讲一碗拉面的故事。中国有兰州拉面，兰州拉面是挺好吃的，但是兰州拉面到现在都还是一个很传统的小店，用餐环境很脏，马路上的兰州拉面我从来不敢去吃。但是我们去考察了一家，味千拉面，是中国人（香港人）把一个日本的品牌买下来了。当时它最困难的时候，受到媒体攻击最多的时候。但是它为

什么可以说是现代服务业呢？中央厨房，统一配送，全国连锁，标准化。我们当时应该是10年去考察的，当时就有600多家。中央厨房，统一配送，全国连锁，依托的都是信息化，互联网。如果没有这种东西，能够做到中央厨房，连锁经营吗？做不到的。所以这一碗拉面成为了一个大拉面。

所以呢，我现在就把概念说到这一个程度，对不对由你们大家来评判。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信息化，标准化，人性化。

**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院）：要不我们先休息10分钟，接下来再聆听专家发言，好吗？

（上半场结束）

## 第二部分：自由讨论

主持人：**周伟民**（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那我们现在开始吧？我延续前面上半段沈主席的主持。那请贾所长先讲。

**贾彦**（福卡智库）：上半场专家的观点都很精彩。这样吧，我结合研究所近年的一些课题研究结果和情况，接着上半场一些专家关于科创中心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在09年和10年，这两年时间，我们的研究所密集地调研了杨浦，张江和漕河泾，等于说是上海的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比较密集集中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在调研之后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我们上海本地的一些科技的企业家或者产业园区的老总，那时候都很焦急。他们说：“如果你们有渠道，或者你们有一些相关的向上面反映的调研报告的

话，请务必帮我们反映一些问题。上海在科创这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深圳，我们的企业规模，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发水平，已经远远地落后于深圳，你不信请上海的相关领导去深圳看一下。”

基于他们这个反映，我们在10年的时候，曾经写过一个调研报告，就是关于上海科技企业整体发展现状的一个调研报告，并呈给了上海的相关部门。然后在调研报告汇报之后，上海发改委的一个领导做了如下评价：“整个调研报告非常有价值，有些东西确实说到了痛点，但是就目前而言，上海搞科创中心的条件还不成熟，虽然俞书记在大小的会议上也多次提到了上海怎么提高科技竞争力。但总体而言我们委办，包括上海各个院的研究机构，还是要把资源整体聚焦在四个中心上面。你们要持续地关注，持续地研究，持续地论证。”我清楚的记得那是2010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很欣慰的是，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上海掀起了一轮要争创科创中心的高潮。那么我在想，当时我们的那份报告曾经也提出过，上海如何成为一个科创中心。我们那时候就选了两个标杆性的城市，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香港，新加坡在90年代初期同时提出要成为亚太地区新兴的科技城市。

当时新加坡政府是委托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做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出了成为科技新兴城市的十大要素，并提炼成为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就是三个边。它说：“作为一个后发的国家，要成为一个新兴的科技大国，最起码要具备三个要素，第一是金融资源的集聚，第二是政府意志，第三是社会市场和人文环境。”那么我们那时候的报告也是引用了这个三角形。新加坡搞到现在搞了20年，整体情况是，没

有成为世界级的科创中心，但在亚太地区，它总体的一个科创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那我们反过来看香港，香港20年搞下来，三条边中，政府的意志，实际上在董建华上台的时候，也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他一直在摇摆。香港回归之后，在整个产业地选择上——科技、金融和房地产，在整个三角形当中，实际上他的资源倾斜还是在房地产和金融上。所以说直接导致了在这20年里它的城市转型计划并不是很成功，也导致了现在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新加坡的话，它整体的政府意志是相当强，它在资源的倾斜上，对科技企业的投入上，投入了巨额的资金。而且新加坡是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但是它的社会人文环境，总体来说比较偏弱。所以说，它搞了20年，只成为了一个区域性的科技创新城市。

那么如果是按照这三条边来进行选择的话，我们来看上海。上海人文和社会环境可能并不是很理想。以前大家也都说过了，上海的“四多四少”——多的是契约精神，少的是冒险精神；多的是规范，少的是野蛮；多的是约束，少的是创新；多的是精英，少的是草根。

那么契约精神有什么不好，实际上你要成为科创中心，光具有契约精神是不够的，还需要冒险精神。光规范有法制，也不够，还需要一点野蛮。前面沈教授也提到了美国波士顿，现在就是美国人的野蛮精神比中国人要大得多。光有约束，我们有强政府，但是缺乏一种创新思维。有很多的精英，海龟，包括我们前面的谢博士，他们都选择上海。但是像马云，考了三年大学考不进，到上海来应聘那么多企业，都不成功。那时候我们到杭州去参加一个论坛，他在上面调

侃到：“我为什么要到上海来？我到上海来应聘了很多跨国公司，都不要我。到浙江，有一家跨国公司要我，我觉得也不适合，所以说我只能选择创业。可能你们上海是没有草根精神。”

这个三条边的选择，我们的人文环境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弱，但是我们的政府的意志，从这次来看，好像是因为有了中央领导的指示，我觉得这次意志相当强，包括市委一号课题，包括这次出台的文件。这与我们5年前汇报课题的时候，唯一的一个领导跟我们讲，“上海搞科创中心条件尚不成熟，还是资源聚焦在四个中心上”的提法已经大相径庭。而且我个人觉得，从那么多的政府课题的研究发现，我们的转弯，好像还能及时跟上进度。包括我们现在承接的很多这方面的课题，现在从市里到区里到产业园区，全部都是围绕科技创新中心在走。

金融资源，前面乔老师和周市长都提到了。我们实际上提了那么多年的金融中心，但是有一个是很欠缺的是，我们不属于权利配置的中心。这个前面大家都提到了，就是我们有很多好的东西，拿不到手里。比如像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在我们海通证券大楼里，关系都很好，都很熟。周市长也提了，那么好的一个资源，我们为什么不合理利用。现在联合产权交易中心连市中心都待不下去，跑到普陀区的一个普通商务楼里面去了。当然现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搬到普陀后，普陀区政府也给他们很多政策上的优惠。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把上海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搬到普陀去，这种地理位置是不合适的。从相对的角度来讲，他们的很多客户还是要跑到海通证券3楼，然后跑到物业抄一下地址，再跑到普陀去。那这样的话，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个金融中心到底怎么

回事？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所以这三条边，决定了上海是不是能够成为全球的，或者地区性的一个科创中心。我个人觉得，现在我们政府的决心很大，但实际上的实施效果，我们仍需拭目以待。

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人员上个星期到上海来，听他们的反应，说现在深圳的领导很着急，原因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上海如此大张旗鼓的要搞科创中心，他们只听到过要搞四个中心，而科创中心从来没听说过。现在你们媒体，上海的领导，大张旗鼓的在搞，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有什么路径、措施、手段？他们需要向上海的同志学习。他说：“须要一些相关材料，我们要向深圳市的相关领导进行汇报。”为此调研了几家机构，然后他们就说，实际上在中国，只有国家的意志才能办成，而他们调研下来，发现上海具有的是地区意志，所以这个科创中心还得要看。

最后再讲两句话，谈谈我个人对这个上海科创中心的看法。我觉得我们上海的同志，上海的领导要办成一件事，只要我们拿出百分之百的干劲来，是肯定能够做成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若干年之后，5-10年之后，可能会形成一个类似于新加坡一样的，成为一个基础性的一个科技企业或者产业中心。然后通过这个基础性的科技企业或者产业中心，带动所谓“互联网+”的高端制造业，和前面周市长提出的这个高端服务业，和金融业。但是如何产生像BAT这样的企业？我觉得光有政府意志还不够。根据我们前面调研里面的三条边，包括金融资源的集聚，包括政府的意志，包括社会人文环境。我觉得只有三条边全部齐了，上海才能产生像BAT这样的企业。好，我就讲到这里。

**周伟民**（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今天计划内的

安排的专家发言，基本上到这里了。那么趁这个机会，把上半段，我的感觉汇报一下。大家虽然是限时演讲，但是才思横溢，涉及的面很宽，真知灼见，各有见地，很有价值。这是对上海的发展很有价值，我是这个看法。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去年习总书记，他所讲的，就是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一系列的要求，而且这个要求里面包括社会智库建设，不叫民间智库。我后来查文献，发现不叫民间智库，叫社会智库，包括你们这个研究室也是的，各级政府的研究室是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一个部分。我们在座的都是社会智库。

今天讲的内容让我感到中国特色社会智库，对国家建设确实是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而且是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这个社会智库也是软实力。那么按照圆桌会议的要求，上半段是聚焦，聚焦上海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下半段是深化。大家还可以继续围绕主题，发散的进行发言，时间上大约限制在 2-3 分钟。可以重复再讲。

**张天明**（上海企业经营师协会）：我想发表一下个人观点。我大概是三年前就听沈院长提出国际科技教育，医疗保健，娱乐文化这三大高地。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沈院长这个提法是很符合上海的实际，很接地气。因为后来我也在信访办挂职过，发现现在老百姓反映的最强烈的社会民生问题，基本上就是集中在教育、医疗这些领域。所以当时觉得沈院长提出的，城市需要经济社会平衡发展，才能长期发展这一观点很有道理。我记得周市长也说过，“四个中心”和老百姓什么关系。

**周禹鹏**（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我插一句，当时我到北京，到重庆。当时他们提了一些跟老百姓比较贴近的，

宜居城市，绿色城市的问题。那么我就在想，当时黄菊书记，徐匡迪市长任职的时候，也提了一些口号，比如说，“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我们要讲“四个中心”，当然也要提一些更老百姓比较贴近，富有人情化的东西。

**张天明**（上海企业经营师协会）：所以呢，我同意沈院长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提出了科创中心，那么“三大高地”与科创中心是一不是二，它不是分开的两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件事情。他们都是属于上海应该不断完善的一种顶层设计，而且可能是现在最需要的。因为“十三五”马上就要开局了，到2020年“四个中心”基本框架形成，那之后上海怎么提升，怎么转型，都需要有一个新的战略思维的引领，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从这个思路讲。

其实刚才我听了周市长讲的，我觉得很受启发的就是，他讲到了为什么上海能吸引高端人才，吸引企业，包括吸引海归，吸引土豪到上海来。那科创中心最重要的还是具有一个吸引力，要把这些对上海科技发展有利的力量吸引过来。我觉得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体制机制与重大项目的关系。从体制机制讲，可能就是要在信息、人才、法制等方面的不断地与国际惯例接轨。从重大项目上讲，就是要进一步满足这些高端人才在教育、医疗文化方面的需求。这样上海才能真正做到海纳百川。如果能集聚全球的高端的科技智慧，研发型人才占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

**周禹鹏**（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我再插一句，现在往往讲到上海，就涉及到成本比较高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需要科学地来研究。当年黄菊同志，提了“三个高一点”——物价比周边高一点，工资比物价高一点，工资的增长比物价的增长高一点，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如果上海是个

物价洼地的话，你想什么资源愿意到上海来呢，对不对啊？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同意。全世界凡是中心，哪怕经济重镇，都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院）：对，好多地方都是这样的。

**周禹鹏**（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我就问他们：“上海的成本这么高，你们为什么还要到上海来？”我当时问这个问题，他们各种各样的回答都有，我把它概括成，对企业的三个要素，对个人的三个优势。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就是相对来说某一项是高的，但是综合成本是低的，因为综合收益高，就业机会多。

**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院）：整个城市的生活品质是高的。

**张天明**（上海企业经营者协会）：今天我发言就是想讲，“四个中心”加浦东开发，牵引了过去30年的发展。举个例子，因为最近股票比较好，2014年上海金融市场的交易总额就达到了78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3%，比2010增长了103.5%；股票证券交易额是全球第三，市值是全球第四位。正是因为“四个中心”提出了金融中心，才能有金融企业这样的一种集聚。一个基本的经验可能就是功能性开发和区域性开发相结合，不断拓展新的增长空间和动力。

那现在的分析呢，可能传统的优势正在衰退，重化工业正在退出，生产性服务业并非不可取代。就是搞研发，搞科技，其实在上海周边都可以，并非只有上海可以搞科创中心。就像刚才大家举了很多例子，像深圳、杭州等等。现在他们科创的文化可能比上海更浓厚一点。而且高房价，教育、医疗等事业的总量缺口很大，这样对人才的吸引力和集

聚对都会受到影响。那么怎样去发挥人才是第一资源，如何才能集聚全球高端的智慧，研发型人才在人口中达到一定比例，那么科创中心才能名副其实。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三大高地”和科创中心的关系。“三大高地”是生活型服务业，也是上海的比较优势所在，也是实现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教育上看，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从医疗上看，上海一年有几亿人次的诊疗量。沈院长曾经讲过，就是要对标波士顿的医疗园区。就上海来讲，我们的医生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可以完全发挥出来。从文化上面来讲，随着迪士尼的开园，如何促进让几百万，上千万次的游客在上海多消费一点，可能能够利用“互联网+”这些概念等，有很多的可以说是服务业创新的方式方法。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如果不把生活型服务业发展起来，生产型服务业也难以发展？因此需要一个更加开放、互动，以教育、文化、医疗为主的服务贸易的发展，不仅要满足本国的需要，而且要面向全世界的市场。

最后，在沈院长刚才讲的“四个中心”加“三大高地”的基础上，我有点不太成熟的想法，就是自贸区应该以正面清单为主，而不是以负面清单为主，要有主导的发展方向。是不是以后可以有这样一个今后的发展战略，就是“五个中心+三大自贸区+虹桥开发”，“五个中心”就是国际、科技、智造、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三大自贸区”是，我国的教育、医疗、文化自由贸易区；虹桥新区就是定位在长三角的现代服务业的一个核心集聚区。我就讲这些，请大家批评指正。

**周禹鹏**（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我简单地说两句，我自己参与了民间智库，第二次因为有事没法参与，总得来说觉得这个民间智库蛮好。我觉得下一步可能建议，民间智库的圆桌会议的机制如何更加完善。我们所讲的民间智库，可能能够与官办智库相互融合，相互结合。因为我也跟旁边的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讲，欢迎他们参加。

对于今天这个题目，我在想，上海新的增长动力，毋庸置疑就是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这肯定是上海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觉得说这个话，三重意思都有。第一重意思是政治的意思，政治的含义我们是要考虑的；第二，我认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个规律。上海经济发展了30年，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是一定要往这条路上走的；第三个就是现实本身也是这样。昨天我们请了一位美国博通公司的中国区总裁，李博士来讲了一下“互联网+”，讲的非常好。“互联网+”不能单纯看做是个工具，讲工具，你可以用可以不用。他认为“互联网+”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什么含义？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就是时间，空间和资源的配置完全变化。所以我认为，现实里也是这样，因为人类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互联网+”的这个时代了，如果你不搞科技创新，你就失去你的地位了。

我在瞎猜，你们在研究的这个动力问题，是不是与GDP的增长问题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说第一个关系有没有这个问题在里面？因为曾经上海市的GDP是始终高于全国的增速的，走在前面的。那么现在全国是“新常态，中高速”，而上海这几年的增速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了今年也不提GDP，不提增速了。那么是不是有种担心上海未来发展的动力怎么样等等的问题？

这根本的动力肯定是科创中心。但是本人的看法，不要再期望上海再来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眼前我很赞成，还是两个轮子一起转。本人在搞服务业，但是我对先进制造业非常看好，我认为不能放手的，绝对不能走成空洞的，空心化的产业结构。那么我认为在服务业里，当前对上海最强的动力还是金融。这一两年里，这个局面是摆在这里的。所以我很赞成，我觉得市委市政府也是这样考虑的，眼前还是“四个中心”，重中之重是金融中心的建设，还是要往前推，比如你讲的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

还有我觉得要考虑创业板的对接问题。现在一讲创业板，都跑到北京，好多所谓创新型的企业，所谓啊，至于是不是创新，我还不敢说。他们都很高兴地跟我讲，他们都打算上创业板了，那是非常高兴的事情。这个趋势很重要。如果所有的创新型企业觉得到那儿是最有前途，最有希望的，那会是什么样的局面？我觉得眼前，恐怕这个事情千万不能放松。还要千方百计，我们要到北京去公关，要争取。我们有这个条件，我们有这么好的联交所，有股权交易中心。股权交易中心的张云峰跟我很抱怨，说现在没人管了，眼看着北交所，就拼命的上来了。这个问题要研究。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股交中心上了两百多家，没有交易。

**周禹鹏**（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对，就是说呀，千万不能放松。然后呢，我认为从长远的，根本的确实还是科技创新，这是一个关系问题。

第二个我就想了，上海是个商业城市，上海文化的本质是商业文化，这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是个什么

关系？我也在想这些事情，大家一起研究研究。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我觉得有道理，我们来理解为什么总书记可以这样提。

我觉得现在讲的科创中心，不是简单的科技成果，科技产品，更重要的是科技资源的配置。就是上海有没有本事把各种有利于科技创新发展资源的配置这种能力做到最强，我觉得这个有道理。否则的话，我也在琢磨，硅谷也不是一个这么大的商业化城市，它不是这样一个概念。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有一次，普华永道的一位人士讲了这样一句话，当然对不对我们可以讨论。他认为：“科技中心跟金融中心是不能兼容的。伦敦、纽约不是科技中心，因为它们是金融中心。”因为它的成本要高一点，待遇要高一点，这对创新是不利的。当然这个我们可以再讨论。

**贾彦**（福卡智库）：我插一句，他们现在得出结论来，说上海自作多情。走的时候，他们政研室主任他说，他跑了那么多企业，本来以为是国家到最后下的决心，他们领导就怕这一点。他说如果真的是国家下了决心，一定要在上海弄，他说这个倒是有点麻烦的。你们把马化腾都弄过来，搞的像真的一样。但是现在他们的报告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就是总书记有了这么一个讲话，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讲话落实到实处，这个是对的。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深圳的竞争力还是比你们强，如果真正拼竞争力，我们是不会怕你们上海的。这就是他们得出的结论。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讲自作多情，这个话是不对的。他说深圳还是很强，这可以讲，这个没问题。这也不是总书记一句话就完了的，不是那么简单，这当然是国

家意志。当然我也认为深圳还是有竞争力的，这是另外一个事情。

我个人觉得就是，创新可以面广一点，包括同济大学“环同济知识经济圈”的那个东西，包括其他创新，加在一起，上海是可以搞的，不一定集中于理工方面的科技。最近我看到杨雄市长有一个讲话，他说：“科技创新关键还是制度创新。”他有一点把这个概念外延的意思。这是没办法的，如果你说纯粹是科技，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北京不能，为什么深圳不能，为什么要选上海。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讲到这个，我想讲讲刚才你提出来的我们的论坛怎么扩大。现在有三家跟我说他们想参加。我说我不能决定，但是我可以把你们的要求提出来，然后大家决定。有一个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下的公共政策研究所，因为你们发言以后，我们整理了材料发出去，他看了以后觉得我们很好，所以提出来参加。第二个是第一财经下面有个研究院，他们也提出来想参加。第三个是我提出来的，我是一直推荐他们参加的，它叫上海法律金融研究所。现在听听大家意见，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个人觉得可以欢迎他们参加。至于发言呢，不一定要每次每家都发言，可以每次指定一些人发言，或者对某一个具体问题有体会的就让他多发言。

**周禹鹏**（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对不起，我还没有完全讲完。所以我认为上海如果要变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就既要注重科技成果，如果没有科技成果，就没有地位，但是更要注重，科技创新资源配置能力的增强，这才是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这是第二个关心的问题。

第三个关心的是政府与市场。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很赞成政府是作科创的环境建设，这个才是重要的。

那么环境建设干什么呢，当然上海整体环境有它的优势。但是我建议要很好地研究上海在这方面的痛点，短板是什么，然后针对这个痛点和短板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我本人就胡说八道了，比如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其他地方可复制，上海自己为什么不复制？该复制要复制啊，这套东西都要用起来。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喊口号，全国都可以复制了，那我们上海内部为什么不能复制呢？

**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院）：我刚刚已经跟他（张晖明）沟通了，下一次轮到。题目大家讨论，地点呢也可以放在这里。

**李放**（远卓管理顾问）：我们这应该是开放的平台，可以出去，也可以进来。实际上就是一个话题一个话题大家认领，做一个主题发言。

**周伟民**（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还有一点，以后机构可以稍微弄个简介，规范化一点，大家彼此熟悉一下。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好的，如果大家同意，下次定了以后，我就通知他们来参加，可以吗？

**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院）：来讨论一下下次的题目。先提个方案出来也行。

**李放**（远卓管理顾问）：我的意见就是，今天开放式的有那么多东西，能不能从这个里面聚焦一个问题？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那我们就讨论政府与市场关系，或者什么？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这个题目太大。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就是科技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企业关系，或者什么？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这个倒也可以。

**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院）：科创建设中存在的环境问题。

**周伟民**（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也不用太着急，你回去在考虑一下，1-2天内告诉我们。

**周禹鹏**（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我倒建议你们，我是有这个想法，要先把痛点找出来，问题找出来。那么现在讲环境，政府的只能主要是造环境。那么上海的环境到底还有哪些痛点？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科创中心建设中的环境问题。

**周禹鹏**（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我们不一定就要这么讲法，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是问题导向，先要找出问题在哪里。

**周伟民**（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你刚才给我的材料里面，韩书记他讲了几个问题，一个呢他讲，科技创新，上海成果不少，但产业化不多；第二个问题是，上海重大成果，甚至跟北京、中央相比，不少，但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气氛没有形成。还有其他两个问题。

**周禹鹏**（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可以以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贾彦**（福卡智库）：我补充一个视角，就是日本跨国公司出过一个报告，在中国国内买专利，上海是第一，北京、广东，现在几乎都买不到了。就是上海科技成果的转化，有没有市场平台，就是你前面所讲的，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前面沈教授已经讲了，大学是创新的第一块牌子，这个问题就是创新之后怎么办？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就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院）：就是科技创新产业化，这个能不能做一个研究？问题到底在哪里？

**周伟民**（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有政府的问题，有资金的问题。我插一句，上次我参加了一个科技创新中心的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里，我的发言其实就是三个经济学家的话，我把它连起来，就理解了这个事。

第一位波兰经济学家，伯罗斯，他说：“伟大创新的根源，从来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经常是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需要更多的看待问题的新方法。”给我一个启示。

第二句话是《英国通史》，据说是中国的一个学者写的，叫钱乘旦，他说：“英国从一个岛国，于19世纪突然跃出地平线，一跃而前，领先走入新文明，率先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研究英国的若干历史可以发现，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英国实际上已经经历过了一场金融革命。”这个是对我们的启示。

第三句话，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希克斯，他说：“英国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直接作用的结果。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也就是说，在工业革命以前，很多创新都出来了，但是它们只能等待着金融革命的到来。“如果没有金融革命到来，便不能使其从作坊阶段走向诸如钢铁、纺织、铁路等大规模工业阶段的到来。”

给我一个启示，就是刚才讲的，金融很重要，金融怎么和科技创新更紧密？特别是大的创新，它需要长期资金，有的是短期的，有些是长期的。这里面，金融的配套体系，不是外面看上去很好的。包括刚才讲的一些，配置资源的市

市场，把它建立起来。科技创新配置资源的市场，专利的市场。上海是个大市场，这方面能不能做一点探索？

**姜永坤**（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我们这个论坛的题目是包容性大一点，然后讨论呢可以自由点。然后我觉得环境这个理念实际上是很大的。因为我这个《22条》没看到，万一它已经讲透了。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上海22条”已经公开了。

**姜永坤**（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哦，公开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不见得讲透，包括你的人文，金融都可以推到环境这个篮子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起个题目还是大一点。可以从大环境这个角度作为切入点，以便大家发散聚焦。这样做好一点。当然实际上也可以直接讲痛点，难点，不需要讲环境。

**李放**（远卓管理顾问）：愿意讲痛点，难点的讲痛点难点，愿意讲体制机制的讲体制机制。

**姜永坤**（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包括金融环境也是环境，刚才讲的人文三条边也是环境，还有就是体制机制都是环境。

**周禹鹏**（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可能大家都已经看到了问题，但是怎么来解决，要有些思路上的变化。譬如说，你刚才前面讲到，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老说这个户口问题。户口重要吗，也确实是重要，重要在它后面承载的东西太多。那么现在上海2400万人，户籍人口只有1360万，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人是没有上海户籍而在上海生活工作的。他能生活工作下去，已经很好了。那么这种问题的解决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思路去解决？我相信他讲的，与吸引科

创资金挂钩，在将来会是一个瓶颈，将来非常难处理，结果导致人家抱怨的不得了，这个非常难操作。

到底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是一种什么思路来解决？譬如说，这些人比较关心的是孩子的上学，好学校为什么不可以稍微放开一点？比如说官方办的好学校不能放开，允许国际资金，民办资金办好学校，这种概念可不可以？可能比你配置户口还更好办一些。

所以对于这些问题和痛点，我们怎么解决的，怎么去破？拿点什么新思维去考虑一下。

**姜永坤**（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最好大家敞开来碰撞一下，我倒建议最后大家每人提几条建议。智库主要是解决问题，提出对策。就几种观点，后面一样提出建议。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下次开会还是定于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一好不好，就是6月29日？如果没有什么意见就先这么定，好吗？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题目我再琢磨下，地点还是放在这里。

（结束）